

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謝仕淵、王美雯、陳怡宏、劉維瑛*

摘 要

本文以 2016 年 12 月 9-10 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之「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基礎，根據大眾生活史、政治史、產業史、環境史、醫療文化史、文學史、公眾史學，以及各種臺灣史料為主題，審酌《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4-2015 年度中的研究書目，進而提出綜合評析與未來展望。

從整體研究成果來看，重要史料的出版對特定研究議題具有影響力，例如二二八事件研究與蔣介石研究的推陳出新，都與新資料出土有關，印證了歷史研究係以資料為基礎的特色。再者，若干研究成果，以論文集形式出版，或能有效凝聚對話，2014-2015 年的研究成果中，蔣介石研究、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史、公共衛生史研究等議題的論文集，均屬此類。

最後，公眾史學與大眾生活史等晚近興起的研究趨勢，頗值得關注，它們或指出史學研究與公眾之間的諸多可能，也或許能提醒身在臺灣的臺灣史研究社群，該如何看待自身學術研究與社會之間的對話關係。

關鍵詞：臺灣史、研究回顧、研究趨勢、史料工具

* 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王美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員；陳怡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劉維瑛，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7 年 5 月 11 日；通過刊登：2017 年 6 月 26 日。



- 一、前言
 - 二、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成果回顧
 - 三、研究評析與展望
 - 四、結論
-

一、前言

為促進臺灣史研究對話，並在新議題上屢有創新，進而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展望，自 2007 年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邀集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每年或每兩年輪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2014 年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加入主辦單位，評介過去一年或兩年的臺灣史研究成果，供學界同仁參考討論，希望藉由研討會提升臺灣史研究水平，成為一個自我省視的機制。

過去十年來，臺灣史研究年度回顧研討會，針對臺灣史研究中各種不同專業領域，如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史等分類，進行研究回顧與討論。但隨著研究日趨專業化，新的議題陸續累積，相關研究成果也成為研究回顧討論的主題，例如體育史、教育史、休閒史、藝術史、音樂史等，2008 年本會議舉辦之初，多被合併討論，但在 2010 年後，前述課題陸續獨立，成為專題而被討論，觀諸近十年來會議議程，便可知臺灣史研究的脈絡與變遷。

此行之有年的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9-10 日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圓形劇場舉辦，是本研討會舉辦近十年來，首度在臺北以外的地方舉行，使臺灣南部關心臺灣史研究的學者、學生、文史工作者與民眾，得以就近參加，展現了臺灣史學術研究社群希望將學術資源進一步廣泛分享的行動。

「2014-2015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兩天的議程，共邀集 12 篇論文，面向廣及大眾生活史、政治史、產業史、環境史、醫療文化史、文學史、公



眾史學，以及工具書與文字史料等。原則上，議題選擇與往年雷同，但如同 2013 年大會以區域史研究為題，藉以評估臺灣史研究對地方史研究的整體成果，2016 年的大會，也因首度移師博物館主辦，規劃了足以彰顯博物館特色的臺灣史研究議程，首度將公眾史學與大眾文化史等研究成果納入討論。

會議中 12 篇文章，大多以評估 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成果為其目的，但如大眾生活史與公眾史學，則為有待擴展的新興領域。論文撰寫者意在指出這些研究概念，如何指向一特定研究範圍的成立，因此評估了方法、概念甚或行動等問題，略異於過去研究回顧取向的論文，但仍不失為一展望性的評估。因此，除了各種主題的研究回顧外，本文擬將公眾史學於評析與展望一節，說明其理論與實踐的各種可能。

二、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成果回顧¹

整體來說，《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4-2015 年度共收錄 2,644 筆書目，包含專書 544 筆、論文 1,763 篇、學位論文 337 篇。以下就研討會 12 篇文章，分為總類、大眾生活史、政治史、產業史、環境史、醫療文化史、文學史等專題討論。

(一) 總類

本節回顧 2014-2015 年臺灣史研究的工具書類與文字史料，工具書類僅 30 筆（包含文章 2 篇，專書 28 本），文字史料類（含史料及史料介紹、解讀）計 346 筆（專書 247 本，文章 99 篇）。以下透過統計數據分析，並分別說明近兩年各種工具書及文字史料的出版方向。

1. 工具書相關出版概況

首先介紹工具書之出版成果，近兩年僅有 30 筆，筆者依屬性將之分為一般工具書（1 筆）、資料庫研究（2 筆）、目錄（8 筆）、年鑑表譜（13 筆）及事辭典（6 筆）五項，以下介紹重要出版成果。

¹ 此節內容多節錄研究回顧研討會論文內容，本文僅就篇幅所需，進行適當濃縮與裁減，並於文中適當處標註為論文作者之觀點。再者，因研討會論文篇幅與題裁有所不同，本文以下各項主題的研究回顧也有所差異。研討會論文全文則可參考「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下載日期：2017 年 4 月 1 日，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



(1)年鑑表譜

工具書數量最多者當屬年鑑表譜，²有13筆，依發行單位而言，除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與《佛光山開山48周年年鑑·2014》由民間單位發行外，皆為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有較多人力、物力且不計成本營收，得以出版相關時序列之工具書籍，例如國史館等單位出版《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8-12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臺灣省主席年譜》系列年譜（含魏道明、俞鴻鈞及周至柔）和《臺灣大事年表》；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出版《臺灣文學年鑑》（2013-2014年版）。

除臺灣文學館例行出版之年鑑外，國史館出版與中華民國政治密切相關之蔣中正年譜長編，體例採綱目體，並於編年體架構下，兼採記事本末。該書提供蔣中正研究者若干線索，對中國及臺灣近現代史研究，也提供基礎性入門認知。³

其次，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臺灣省主席年譜》系列年譜與《臺灣大事年表》，同樣為時序列，年譜以人物（省主席）為中心編次，也提供相關基礎入門。

政府出版工具書特色為皆由國史編纂相關單位編輯，本身所具史料性質即以政府相關資料為主，因此側重面以政治人物為主似無可厚非，未來如能與民間家族或收藏單位合作，發行其對立面之政治人物或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相關年譜，或許當能更多元的呈現當時政治時空背景。

(2)目錄工具書

以下接著介紹數量其次的目錄工具書，整體呈現臺灣史研究風貌者有中研院臺史所出版《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3、2014年度，同為學術出版目錄者有〈金子えりか先生著作目錄〉、《近史所一甲子：同仁學術著作目錄》及〈客家研究臺灣相關期刊論文書目彙編：2010-2013年〉。這類工具書對瞭解臺灣史整體或主題性研究概況有幫助。

其次則為具史料主題性的目錄編輯，如中島利郎等編《〈台湾日日新報〉近代文学關係作品目錄：昭和編・1926-1944》及川瀨健一編《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れた映画：1899（明治32）年-1934（昭和9）年》、《植民地台湾で上映され

² 指年鑑、年表、年譜之簡稱，即以時序列為主的工具書。

³ 陳佑羽，〈《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新書發表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臺北）8（2015年6月），頁233-236。



た映画：1935（昭和10）年-1945（昭和20）年》。

中島利郎為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曾編輯《『台湾民報・台湾新民報』総合目録》、《『台法月報』総合目録》、《『台湾時報』総合目録—著者名索引付》、《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等，堪稱日本統治臺灣時代相關報刊目録的編輯專家。

川瀨健一則針對日治時期曾在臺灣上映電影之整理目録，此人自述曾在臺灣教授日語及臺灣電影史，並自行創立東洋思想所，出版臺灣民俗、電影史及文學書籍。上述兩本目録即為其整理成果，提供日治時期在臺上映電影之線索，對研究臺灣電影史有極大助益。

日本學者較願意投入心力編輯整理相關史料目録或復刻史料，或與其研究傳統有關，即先全面性掌握史料，而第一步即為盤點相關史料目録。臺灣方面出版工具書一則小眾市場，二則願意投入心力者較少，或可由官方組織、號召學者及研究生投入編輯類似工具書。

(3) 事辭典

工具書第三大類為事辭典，共有6冊，2冊為舊書重印，不予討論。其餘4冊皆為官方出版，分別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地名辭書（卷24）金門縣》、《臺灣地名辭書（卷25）連江縣》及《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以及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臺灣文學史小事典》。地名辭書由施添福總編纂之組成團隊撰述，已陸續出版幾十卷，該系列學界素有好評，對理解臺澎金馬各縣市之地名基本沿革有入門參考的價值。其次則為主題針對性之事典，如《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為臺灣文獻館考量研讀臺灣總督府檔案所需參考工具書而編輯出版，其後續則規劃《研讀臺灣總督府檔案入門》，俾使入門者得以瞭解總督府檔案之概況。

關於事辭典的編輯，過去曾有吳密察監修之《臺灣史小事典》及許雪姬員主導之《臺灣歷史辭典》等，這些事辭典適度回應了解嚴後民間、學界甚至教學現場對臺灣史研究的期待。然而這類事典為全面性概述，深入各主題之說明難免有所不足，因此主題性之事典即有其需要，陸續開始有諸如前述之事典出現，反映了臺灣史學界資料整理與研究的深化。

就筆者管見，相關事典仍有許多亟待編纂。諸如以時代劃分，近二十年來早期臺灣史（十六~十七世紀），無論史料編譯或研究主題投入，都已有一定成果，



因此「早期臺灣史」為主題之事典似乎也有必要編輯出版，俾使後學有所參考及自學入門。諸如荷西時代的臺灣統治機構之制度、經濟、社會制度、文化、甚至殖民母國對殖民地之統治相關制度文化等，相關史料介紹及相關詞語的說明、船隻等都值得編輯相關事典，甚至近年較少人投入的清代臺灣史也應編輯。又如以產業或職業為例，臺灣近現代殖民經驗造成之臺灣重要職業產業，如糖業、林業，以及臺灣法律史事典、臺灣醫學史事典等，在研究能量逐漸蓄積的同時，官方出版單位似乎可委託相關專家學者進行編纂。

(4)一般工具書

最後，許雪姬主編的《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是一具有指標意義的書籍。戰後臺灣的口述歷史，早先是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國史館較有系統的開展。解嚴之後，針對重要政治事件，以張炎憲為主開展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口述歷史，中研院許雪姬及其團隊也積極進行各類口述歷史訪談，此後近三十年間口述歷史數量更有爆炸性的成長（以近兩年為例，史料相關基本上以口述訪談為主，詳見後文）。因此 2009 年成立「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2013 年更名為「臺灣口述歷史學會」），該學會宗旨為結合國內、外相關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學術團體機構，促進口述歷史相關之製作、應用與研究。口述歷史應用層次相當廣泛，堪稱大眾史學重要的一支。該學會也積極出版相關工具書籍，如 2013 年出版《口述歷史實務手冊》，2014 年更出版此書，分為理論篇、實務篇、案例篇及附錄等四部分，正反映了近三十年來臺灣的口述歷史研究成果，並回應廣大社會大眾的需求。

整體而言，臺灣史的工具書出版，由於成本考量及出版銷路等問題，出版單位多為政府機關，而政府機關由於其屬性而出版該機構相關執掌之工具書，難免有所侷限。如何結合學術界研究成果，開拓、開發出版更多有利於研究使用者、甚或一般社會大眾的工具書，則為政府機關及學界所應攜手面對之課題。

2.文字類史料出版概況

(1)史料介紹解讀出版概況

如前所述文字史料類（含史料及史料介紹、解讀）計 346 筆，其中史料介紹解讀類占 37 筆，史料類則有 309 筆。以下先分析史料介紹部分，其中文章占 33



篇，專書僅有 4 本，顯見通常是在期刊論文披露、介紹若干新發現史料。由於史料介紹較為紛雜，不易分類，故先以時期進行分類，通論（跨時代）部分有 10 筆，其中近現代仍占約 6 筆，無專門介紹清代以前之史料，介紹清代史料有 7 筆，日治 15 筆，戰後 5 筆。由數量來看，近現代（日治以後）占壓倒性多數。

以通論為例，可粗分為兩類，一是介紹史料及蒐集經驗者，值得提出者如杜正宇〈海外史料蒐集經驗談：以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之近代臺灣相關檔案為主〉，其歷年來受政府單位之委託，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蒐集臺灣相關資料，主要介紹二戰、接收相關及美援時期史料，顯示 NARA 還有許多重要臺灣史料值得挖掘及有待運用。

另一類則是史料衍伸的解讀，值得提出者有邱淑敏的碩士論文〈家譜資料時空探索：以猶他家譜學會之臺灣族譜目錄為例〉，以地理學取徑，透過文獻探討，將「猶他家譜學會調查之臺灣族譜目錄初稿」作為研究樣本，以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也可謂開拓族譜史料研究的新路徑。

7 筆清代史料介紹中，5 筆是清代常見史料——古文書或檔案的介紹及研究，剩下 2 筆則較為特別，分別是〈關於臺灣音樂館藏清樂抄本〉及聶友軍〈1874 年橫濱英文報刊對「臺灣遠征」的報導：以《日本笨拙》與《日本郵報周刊》為中心〉。其中聶文運用 1874 年日本出兵臺灣事件中，橫濱兩家英文報刊對此事件的報導及其後來轉向，分析其代表的歷史意義，運用此一英文史料，提供臺灣事件的不同觀點。

利用清代古文書史料的研究，較有意義者有吳佰祿〈「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19 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該文從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的恒春縣行政文書，試圖透過探討 11 件清末官方文書，反映統治機構試圖進入原住民領域並改變其傳統結構、建立新區域性架構的各種互有關聯之措施及其問題。⁴

日治時代史料介紹最多，以介紹為主。公文書或官方出版品有 7 筆，私文書則有北村嘉惠〈「吉田巖遺稿資料」所収の台湾關係資料：概要と目錄〉，北村嘉惠編著《吉田巖の「台湾学事視察旅行」關係資料》、〈森川竹溪の手稿、識語と

⁴ 吳佰祿，〈「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19 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臺北）68: 3（2015 年 9 月），頁 45。



藏書について：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所藏書を中心として）、〈動亂時代の跨國情誼：從朱點人致莊垂勝、岸田秋彥的新視野〉及黃震南的〈「蔡培火日記」原寫本之價值〉，其他則有〈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考釋〉等文章。

以上值得注目者為北村嘉惠挖掘的吉田巖臺灣相關資料。吉田巖（1882-1963）為日本福島縣出身，1906年以北海道帶廣一帶為據點，從事阿伊努（アイヌ）兒童教育及阿伊努文化鄉土史調查研究，留下龐大的資料群，北村特別製作了「吉田巖遺稿資料」的臺灣關係資料目錄，並將與臺灣特別相關的「臺灣學事視察旅行」（1927/5/27-6/30）相關資料進行繕打彙編並介紹。編者希望透過吉田的資料提供阿伊努史與臺灣原住民史研究深化及相互討論基礎的連結。

戰後史料介紹中，純史料介紹者有3筆。除史料外，搭配研究者書寫及說明在內，開創較為特殊寫法者，則有呂蒼一等人《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及《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其中呂蒼一等人的著作，除搭配白色恐怖時期無法送達的遺書本身外，也穿插受害者家屬之訪問，並以文學感性筆觸撰寫，是介於史學與文學的書寫模式，雖較易為讀者接受，但似乎也模糊了史學著作與文學作品間的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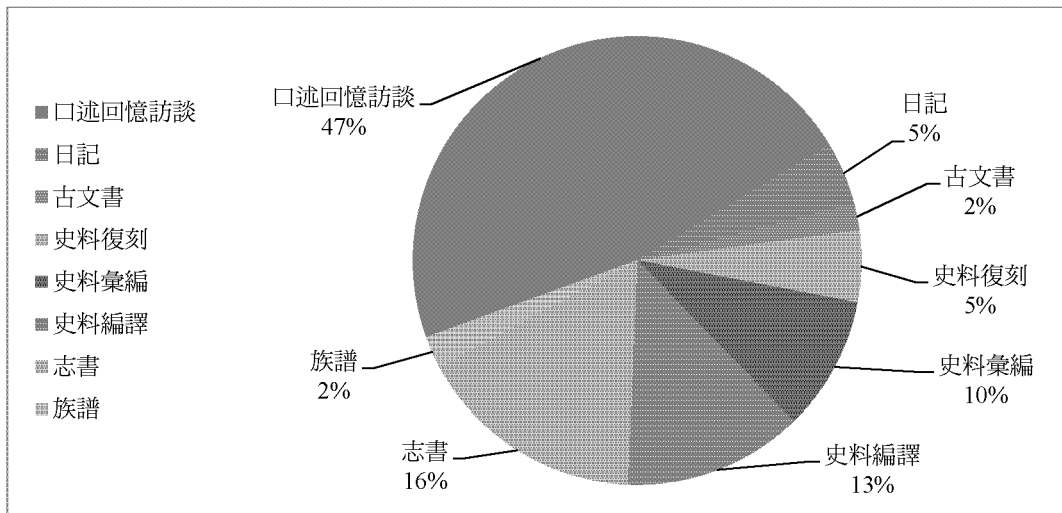
基本上，史料介紹、解讀部分，因各種史料因素，主題較為分歧，筆者行文著重挖掘該時代不同以往的新史料，以及如何運用史料提出較具意義的問題，詳細討論如上述。未來史料介紹、解讀撰寫者，或可多加思索該新出土史料對該研究領域或研究主題所能提供的不同解讀或視角，當能更加豐富史料介紹的深度。

(2)文字史料（含志書及族譜）出版概況分析

文字史料類共計309筆，⁵其中專書243本，文章66篇，以專書多，占79%。如以時代區分，光是戰後就占了50%，共154筆，日治也占了25%，共78筆，而通論（63筆，占20%）部分除志書與族譜42筆外，基本上也是日治到戰後為主。其餘史前與早期2%，清代則占3%。因此2014-2015年的文字史料類，近現代史（日治及戰後）部分就高達約8成以上，相較之下清代以前只占約5%的數量，可說微不足道。推究其原因，在於日治及戰後，由於距今較近，無論公、私文書留下數量甚多外，也因其中有不少為口述回憶訪談，屬新創造出來的文字

⁵ 若干如口述歷史書籍為舊書再版，不列入統計與討論。





圖一 2014-2015 年文字類史料細項比例圖

資料來源：筆者統計所製。

史料。以下從各細項類別進行分析。

為方便統整，筆者區分文字類史料為幾個細項，其所占比例如圖一。

其中，口述回憶訪談 145 筆（專書 94 本，文章 51 篇）、日記專書 14 本、古文書 8 筆（專書 7 本，文章 1 篇）、史料復刻專書 16 本、史料彙編專書 30 本、史料編譯 40 筆（專書 26 本，文章 14 篇）、志書專書 49 本、族譜專書 7 本。⁶

顯見以近兩年文字史料出版為例，口述回憶訪談就占了將近一半，而當事者自己留下的日記書寫則占 5%。這些基本上是近現代史（日治及戰後）的史料，顯見晚近由於史學大眾化的影響，史家積極針對一些事件、產業及經歷者進行口述訪談，創造出新的、不同於官方說法的史料。古文書、史料復刻、史料彙編及史料編譯等占比約 30%，為文字史料出版的第 2 大類。最後則是志書及族譜這類傳統史料編纂，計 18%。

A. 口述回憶訪談及日記類

以下從口述回憶訪談類（以下簡稱口述類）開始，進行近兩年出版重點回顧。口述類（145 筆）史料，如以出版單位的屬性粗分，根據筆者大致統計結果，官

⁶ 志書與族譜，2012-2013 年之研究回顧特別分開列出，但考量志書及族譜在中研院臺史所編輯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都被列入史料類，故一併予以討論。



方（含中央、地方或公立學術單位），合計 80 筆，民間也有 65 筆，顯示不僅官方或公立學術單位積極推動出版口述回憶訪談，民間單位或出版社也積極從事相關出版，這或許顯示不僅官方，民間單位、甚至出版社也認同口述歷史資料的重要性，亦反映了此類資料有出版市場及其價值。

口述類史料主題類別相當多元，有如特殊主題，如產業別、學校別（參閱原論文附錄 3，以下不特別論述此兩類別）、特殊事件（如政治事件、戰爭）、有日治生活經驗之日本人、女性生命史（15 筆，占 10.3%）、也有一般人或政治、文化等各界名人、口傳文學或地方傳說等，此外，較有意思的是，以往有訪談經歷者也成為受訪對象。其中女性僅占 15 筆，且多筆為共同受訪，顯現口述歷史訪談之際，男性受訪者仍遠多於女性，可見其中性別比例差距之明顯，即使在口述歷史訪談盛行的當下，仍無法彌補。有論者認為過去女性多在家庭操持家務，故其個人生命史與社會等大歷史較無關連，但其差距與所占性別比例差距仍過大，顯然有待未來從事口述歷史者意識此一問題。⁷

以下擇要舉例回顧近兩年之口述類史料。2015 年為二戰結束 70 周年，因此近兩年也有一些關於戰爭相關主題的口述訪談出現，諸如〈「臺北南機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新竹第六海軍燃料廠人員之回憶〉、〈臺灣少年造飛機：王金生口述史〉、〈「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一〉、〈「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二〉、〈「宜蘭人的戰爭經驗」系列之三〉、〈臺灣特設勤勞團員林正興口述歷史〉、《古寧頭戰役：65 位參戰官兵口述歷史暨 65 週年紀念戰地巡禮紀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成立 60 週年紀念特輯》、蔡金鼎《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口述歷史》、アクティブ・ミュージアム「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編，《日本人にされた阿媽（アマー）たち：台湾・「慰安婦」の証言：第 11 回特別展カタログ》。基本上是地方文獻、臺史博、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中研院臺史所為主要出版單位，內容多是戰爭相關經

⁷ 〈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戰爭記憶〉一文，針對關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記憶之現有訪談紀錄出版品進行統計，共計 97 本書；151 位受訪者中，男性為 135 人、女性為 16 人，比例分別為 89.4%與 10.6%。也與近兩年口述歷史出版品中的比例大致相同。參見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戰爭記憶〉，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南市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戰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經驗與論述國際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2015 年 10 月 25 日），頁 9。



驗的口述訪談。較為特別者是位於東京的「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所編、2013年於該館特別展示的圖錄，內容是臺灣慰安婦課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戰前的慰安婦問題外，該展示也延伸到討論戰後所謂的「軍中樂園」，可謂較有歷史連續性探討的意義。同樣有此歷史延續感，蔡金鼎針對高砂義勇隊及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的口述歷史，日治時期有8次高砂義勇隊，但到了戰後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又轉為國軍參與戰爭，該書試圖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歷史書寫，記錄其生命經驗。

其次，政治相關的主題仍是重要面向，一是圍繞白色恐怖主題，如《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中）（下）、〈廖麗川先生口述紀錄〉、《禁錮的青春，我的夢：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政治標記，白色夢魘：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3》、《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重生與愛：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等。顯示在政治解嚴後的多年，白色恐怖受難經驗仍是臺灣社會關注的主題，尤其相關受難者年事已高、逐漸凋零，故無論相關單位或受難經驗者，都努力在其生命最後留下屬於自己的聲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過往專注於受難者本身，近兩年開始有系統地訪談其女性家屬，記敘雖未入獄，卻也同樣是「獄外之囚」的處境。

政治相關主題還有諸如各類光譜政治人物或參與者的口述，如《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從抗日到反獨：滕傑口述歷史》、《臺灣統派運動口述史》、《ある台湾人の数奇な生涯》、《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百戰將軍陸志家回憶錄》、《李宗仁回憶錄》、《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機要秘書詳談宋美齡》、《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誠的力量：黃昆輝八十憶往》、《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外交生涯四十年：外交幹將劉瑛回憶錄》、〈漂流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者：洪傳源先生訪談〉等。

從這些政治參與者的口述出版，可看出從獨立到統一派別之間各色光譜都有，筆者認為這些出版或可顯示兩點，一是政治意識型態上對立的政治時空已然逐漸消退，而這些年事漸高的相關意識型態者，亟欲留下對自己有利的論述，使後人知道其所思，另一則是臺灣已然逐漸形成可接受各種多元聲音的社會。



可見證近兩年口述歷史主題多元者，還有諸如女性及原住民相關的口述資料。女性主題除前述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及慰安婦外，也有如〈竹東范彭喜妹女士：口述生命史〉、《一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紀錄》、《金釵記：前鎮加工區女性勞工的口述記憶》、《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杜潘芳格生命史》、〈廖清香女士訪談紀錄〉、〈蔡瑞月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蕭渥廷氏および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暗暝 é 月光：台灣現代舞踏先驅蔡瑞月》監督・陳麗貴氏に聴く〉、《眾女成城：臺灣婦運回憶錄（上）（下）》、〈証言と資料／飛舞人生：台灣現代舞踊家・李彩娥氏インタビュー〉、《歌仔戲實錄》。這些口述關注各職業別的女性，顯示女性為主的口述歷史正逐漸受到重視。

原住民主題除前述原住民軍人外，還有《太魯閣人：耆老百年回憶・男性篇》、《阿美族口傳文學集》、《泰雅史詩聲聲不息：林明福的口述傳統與口唱史詩》、《大甲溪流域泰雅爾變遷傳奇：林誠牧師回憶錄》、《末代 sapalengaw 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 年錄音重現》等。這些主要仍是耆老訪談或口傳文學之類的主題。

其次則是近年來，日本人在臺灣的生命經驗也逐漸受到重視，〈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生活誌〉（6）（7）、《台湾口述歷史研究》10 期、《台湾・乳なる祖国：娘たちへの贈り物》等。原先這些日人在臺生命經驗，主要是在日本及其出版界出版較多。日人在臺的生命經驗也逐漸受到臺灣各界重視，顯示過去從政治觀點以殖民與反殖民為主的「大歷史」論述之外，關於殖民地時期臺灣人與日本人，以及在臺日人之間的生命經驗（所謂「小歷史」）為主之論述也逐漸受到注目。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是訪問者的人也逐漸成為受訪對象，成為口述歷史的外一章，這類訪談有《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黃榮洛生命史》、《新竹縣客家文史學家口述歷史專書：楊鏡汀生命史》、〈近史所口述歷史組召集人游鑑明教授訪問紀錄〉、〈口述史達人訪談：侯坤宏先生訪問紀錄〉，代表口述歷史發展已經達到本身即可被研究的「口述歷史」之歷史研究課題。

由於近年的蓬勃發展，也因此有前述口述歷史學會及相關口述歷史方法理論等論述的產生，顯見口述歷史工作者已然到了必須面對口述歷史的種種問題，諸如口述歷史內容的可靠性、正確性及倫理問題等。關於口述歷史的相關問題，除可參照相關書籍外，近年來也有針對不同時期、同一受訪對象或受訪事件的研究



反思，如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⁸ 該文分析「1950年代白色恐怖」口述史、回憶錄中出現的「多版本」問題，認為在1990年代的臺灣，見證隱匿的「國家暴力」，常被視為促成「民主化」的重要工作。當時有大量「隱匿」的當事者「現身」，接受訪問或書寫，使「說」與「讀」的權力開始普及。但在二十年後，作者回顧相關史料，卻常發現同一當事者於不同時間的「自我故事」，出現情節不一、嚴重矛盾的現象。該文作者認為要理解這樣的現象，必須將「大眾書寫」還原到產生時空，除了強調當事者的「能動性」，也必須注意「結構」因素對「書寫」的影響。林氏所提見解，筆者除贊同外，也認為臺灣的口述歷史已面臨必須認識到口述歷史不應為單純的史料，而必須有「後現代」史學的眼光，亦即這些史料是變動的論述。然而訪談者往往與時間賽跑，可能也只有一次的受訪機會，因此這些一次性或單一時間向量內的訪談，在運用到史學研究之際，必須有意識地考量受「結構」侷限的問題。

其實這類問題不僅出現在白色恐怖問題，由於臺灣開始可談論二戰時期臺灣人從軍等相關事務時，能訪談對象已然是1920年代以後出生者，但在1930-1945年代時期的30歲、50歲甚至70歲不同世代的臺灣人聲音，卻無從知悉。因此僅能得知「戰爭世代」，被迫於戰後公共領域消音後亟待復權的聲音，然而他們的父祖輩（不同世代）對此戰爭的「戰後看法」，基本上已無從得知，僅能從少數戰後初期的報刊資料尋覓若干。⁹

以下接著說明同樣由當事人書寫表述，但不同於口述歷史為事後追述，而是事情發生當下的紀錄日記。近兩年日記類出版，簡單可分為三類：日治時期官員日記〔《內海忠司日記 1940-1945：總力戦体制下の台湾と植民地官僚》〕、日治時期臺灣人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1926年、（十四）1927年、（十五）1928年、《楊水心女士日記》（一）1928年、（二）1930年、（三）1934、1942年〕，及中國近現代史人物日記〔《陶希聖日記：1947-1956》（上）（下）、《吉星文先生日記》（一）（二）、《胡宗南先生日記》（一）（二）、《陳誠先生日記》（二）（三）〕。

⁸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臺灣》（臺南）8（2014年11月），頁35-81。

⁹ 例如周婉窈認為研究二戰時期的臺灣人，必須注意「世代」問題。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13（序）。



日治時期的官員日記文書，過往已有如田健治郎日記、後藤新平文書等出版或公開，而地方官員層級較為罕見，近年曾任高雄州知事等職務的內海忠司日記資料的出版，可謂較為特出之發現。本書為其第二系列 1940-1945 年部分，之前第一冊《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國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灣》，與殖民地臺灣較有關連，此第二冊為其退職後的後續情形，並附有擔任州知事時的執務資料。透過內海的日記，我們可以得知戰前地方州級官員的人脈關係、休閒娛樂等面向。該書的特色是除了重新繕打、彙編資料外，也組織相關研究者撰寫內海忠司日記的研究，使我們得以更瞭解此批資料運用的可能性。

日治時期臺灣人日記，除持續進行的《黃旺成先生日記》外，也開始編輯士紳階級之妻的日記，如近兩年中研院臺史所整理出版的楊水心（1882-1957，彰化人，楊晏然長女）即為霧峰林家林獻堂之妻。楊氏有寫日記的習慣，卻不一定每日均有記載。中研院臺史所現存的日記，是由家屬提供的原件 3 冊（1928 年、1934 年及 1942 年）及他人提供的影印檔 1 冊（1930 年），使用文字主要為臺灣長老教會通行的羅馬白話字及漢文。楊水心曾參與愛國婦人會及臺中婦女親睦會等婦女團體，並積極參與一新會的各類活動。日記內容呈現出大家族主婦關注的事務，包括祭祖、年節、親人往來動態等生活點滴；對外則是參與一新會等活動；休閒娛樂則有讀報、看電影或旅行、購物、上餐廳……等。¹⁰ 由此日記可看出不同於士紳階級男性的觀點，提供我們另一觀察面向。

中國近現代史人物日記可舉陳誠日記為例，陳誠（1898-1965）在戰後歷任臺灣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等職務，對臺灣影響甚大。其日記從 1931 年 2 月至 1964 年 1 月為止，部分散失或殘缺，留存者約 21 年。日記中可窺探蔣中正與陳之關係，許多當時重要事件及如何推動政務也多有留下線索。此日記共分三冊，第 1 冊為 1931-1944 年，第 2 冊為 1945-1960 年，第 3 冊為 1961-1964 年，書後並附有人名索引、照片。¹¹

近兩年日記出版，除中研院臺史所延續過往出版外，值得注目者則為殖民地官僚如內海忠司日記史料的挖掘及出版，另一大宗則為國史館出版中國近現代史

¹⁰ 以上介紹參見〈楊水心日記：世家大族的女性日記〉，「流轉風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下載日期：2016 年 11 月 29 日，網址：<http://herhistory.ith.sinica.edu.tw/Story17.html>。

¹¹ 葉惠芬，〈《陳誠先生日記》簡介〉，《國史研究通訊》（臺北）8（2015 年 6 月），頁 222-225。



人物，其中與臺灣歷史較為關連的則為陳誠日記。期許未來如能發掘更多臺灣庶民、或非菁英階層，特別是女性的日記資料，或許更能豐富臺灣史的日記資料。

B. 史料彙編、復刻、編譯及古文書類

近兩年史料彙編有 30 筆，大致分為幾類，一是文學相關史料彙編，共計 12 冊，占將近半數，其中以臺文館出版叢書最多，如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系列；另一類則是政治或行政相關史料彙編，如《中華民國南疆史料選輯》、《高雄史料集成第二種：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蔣渭水先生全集》、《烈日顯影：1937-1945 年日據金門檔案史料彙編》、《65 風華傳承美好：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949-2014》、《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姓名篇》(上)(下)、《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藍明谷案史料彙編》、《金門的戰爭與和平：823 砲戰期間美國外交文書有關金門文獻選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史料彙編·回復國籍篇》、《浦薛鳳子女海外書簡》。

這類史料多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及地方文化單位出版。值得提出的是近年來高雄開始努力出版當地史料，並推出史料集成，因應乙未之役 120 周年，吳密察主編高雄地區的乙未之役史料，並擴及臺中以南地區，其中收錄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劉氏之公牘函稿簿，以及臺史博的劉成良劉永福書信及告示史料，皆為首次刊行，其餘收錄史料較為常見，且較為可惜的是此次彙編並未重視版本之輯校等問題，已有書評討論，不再贅述。¹² 另外離島縣分還有金門的相關文獻出版，分別是日本占領時期的官方及民間史料，以及戰後八二三砲戰的資料，也都凸顯了「戰地」金門異於臺灣島的特殊性。《烈日顯影》還特別收錄僑刊《顯影》停刊時期刊載相關人士薛永棟撰寫的〈八年滄桑錄〉，提供後人瞭解二戰軍事占領時期金門的社會面貌。

最後一類為私文書，如《堤林數衛關係文書選輯》及《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日文校勘版）》¹³ 皆由中研院臺史所出版。堤林數衛（1873-1938）1896 年自日本山形縣來臺，擔任茶商郭春秧通譯，並至南洋經商，透過此文書可瞭解臺灣銀行的海外經營史、以及南洋華人與日本人間的競合關係。陳何為簡吉之妻，到臺

¹² 郭明芳，〈公館領頭理文獻，乙未一編嘉後學：評介吳密察主編《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臺中) 6 (2016 年 6 月)，頁 49-55。

¹³ 此類本應為史料復刻，但因其為校勘本，故列入史料彙編類中。



南報考臺灣總督府臺南醫院助產婦講習所，並取得執業執照，此為其上課筆記。

史料復刻類近兩年主要有幾個動向，一是日本出版單位的史料復刻，日本數家出版社（如ゆまに書房、大空社及不二出版）一直積極推動包含殖民地臺灣在內的戰前史料復刻，近兩年的主要成果有「近代台灣都市案内集成」系列，以及河原功編輯的《資料集・終戦直後の台湾【編集復刻版】》。《近代臺灣都市案内集成》編者試圖透過如《臺灣鐵道旅行案内》等旅遊導覽手冊，復刻這些從旅行、地理、民俗等觀點介紹臺灣的資料，深化理解所謂日本內地對「外地」臺灣的印象及日本帝國下臺灣的歷史性格。這些史料並非全面復刻，而是編者選擇性收錄。另外值得注意的，同樣搭上二戰結束 70 周年列車，河原功編輯《資料集・終戦直後の台湾》，係戰爭結束前後擔任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秘書官、外務省管理局總務部南方課課長的齋藤茂，所收集並記錄之 1945-1946 年資料，提供理解「終戰」後混亂期的臺灣樣貌。

另一復刻動向為臺史博、臺文館、六然居資料室共同出版復刻的《臺灣新民報》（共 5 冊）。自發行日刊後，目前《臺灣新民報》留存於世者相當稀少，臺史博與中研院臺史所合作，將楊肇嘉家屬與六然居資料室所擁有的相關報刊資料進行數位化；同時，連結中島利郎教授於 2000 年將 1933 年間約 5 個月報刊資料的私人收藏，捐給臺文館；2013 年，臺史博也輾轉獲得 1939-1940 年的部分報刊，拼湊部分缺漏。這些報刊雖仍是斷簡殘篇，然而就當時自稱「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及「臺灣人之喉舌」的報刊而言，由臺灣人（至少是知識分子）立場如何理解當時社會，也提供我們除了親官方的日人報刊《臺灣日日新報》以外之視角，以及理解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樣貌更多的素材。

史料復刻並非近兩年之主流，然而有計畫的復刻，提供研究者多元史料，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未來期許更多單位及出版社願意有計畫發行相關史料復刻。

關於史料編譯，依時序列區分，重要的早期史料如《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Ⅲ-V 冊）、《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Ⅱ》，清日之間適逢甲午及乙未之役 120 周年，故有《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麥格麗琪（Millicent M. McClatchie）1895-96 年臺灣遊記〉、《甲午戰爭・臺灣篇：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專輯》、《福爾摩沙的巴克禮》的出版，日治時期則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



書》系列、臺史所出版《茶苦來山人の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以及地方文化單位出版相關史料，如〈昭和五年澎湖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新竹廳志》、〈《臺灣日日新報》宜蘭「匪徒」歸順報導輯錄〉等，戰後則僅有《臺灣獨立建國運動史初稿》。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由於其執掌，出版近兩年最大量的史料編譯書籍，除了傳統所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編譯外，也規劃出版荷蘭時期臺灣長官書信集等。早期臺灣史料，由於多數研究者有語言隔閡問題，比起日文史料更有難度，故系統性的史料編譯更顯其重要性。

此外，戰爭相關之史料編譯也是一重要趨勢，如中研院臺史所與臺史博合作出版之《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編譯文字及圖像史料，文字史料編譯三種隨軍見聞史料：1.日本隨軍攝影師遠藤誠編撰之日文〈征臺記〉，此資料係由臺史博提供原件影像，約計 7 萬餘字，為本書最大篇幅之文字史料；2.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大學圖書館收藏之美國記者達飛聲的隨軍採訪英文筆記，約 1 萬餘字；3.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所藏日本傳教士細川瀏之日文〈渡臺日記〉，約 3 萬餘字。圖像史料則主要來自臺史所檔案館收藏之「北白川宮家在臺行跡圖像」、遠藤誠所編《征臺軍凱旋紀念帖》、「達飛聲家族檔案」，以及私人（郭双富先生、楊儒賓教授）收藏等。這些編譯資料分別從日本攝影師、傳教士及美國記者的角度出發，圖像史料則主要有當時罕見的照片史料，可說具有相當之價值。臺史博的館刊也編譯、出版了乙未之役時期，英國女性麥格麗琪在淡水的遊記，提供不同於男性及其他記者等人的觀點，可謂從另一女性角度觀看乙未之役。

另外，為了讓一般關心地方文史的社會大眾得以瞭解日治時期以日文書寫之史料，地方文化單位也陸續編譯多種日治時期地方志等資料，成為近兩年編譯史料的另一潮流。

史料編譯復刻或彙編部分，可見清代臺灣史料挖掘、出版較少，多集中在古文書類，以下擇要介紹。近兩年家族古文書居多，其中值得介紹者有黃富三等入解讀《霧峰林家文書集》，主要是棟軍相關史料及林朝棟系下的田業租谷，分別收錄林朝棟所領棟字各營營官、幕友，1892 年前後大崙崙征番戰役期間及善後過程中，與棟隘各軍支應處的林拱辰等人往來信函、霧峰林家與林朝棟所率棟字各營的收支記賬相關文書，以及林朝棟系的土地相關文書，其中糧銀、租簿等類別，



一般古文書集中較為罕見。從這些史料我們可以瞭解晚清霧峰林家在所謂「開山撫番」事業下如何進行及運作，以及相關土地田產經營之細節，對理解晚清臺灣社會有相當之幫助。

綜上所述，史料彙編、復刻、編譯及古文書類，分別因應其史料特性、不同的出版單位，而選擇彙編、復刻或編譯等。究竟選擇何種方式較為適合史料，其實各有其優缺點，復刻最為省事，然其語言或解讀障礙則使一般非該領域或語言之研究者無法親近、使用，彙編雖有其好處，但過程中可能導致原始史料中之編排方式及其史料本身意義脫落，編譯一樣可能面臨語言轉換之間差異的問題。此外，由近兩年發展動像可看出，史料出版基本上都集中在幾個特定單位，尤其以官方或學術單位為大宗，因此類史料出版除專業要求外，通常需投入大量時間、人力、經費成本，然而其回收獲利卻幾乎難以奢望。因此未來這些學術及官方單位，彼此之間如何互相傳遞訊息、相互合作，仿效日本方面出版整理史料之方式，打造臺灣歷史史料系列，分進合擊，如何有效運用有限的時間、人力與費用，分批均衡並整理、出版各時期、各領域的臺灣史史料，以方便研究者使用為原則，甚至在整理之際，即考量未來製作資料庫可能之電子檔格式，當能使出版的史料發揮最有效率之運用。

C. 志書及族譜類

志書主要分為幾類臺灣全志、各縣市鄉鎮等方志、廟宇沿革志等，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縣市政府及廟宇編纂。這類方志有長久的編纂傳統，在此不一點評，有興趣者可直接參閱原論文附錄之志書類。此類方志的品質好壞，端賴實際編纂者用心與否，若干編纂者認真蒐集地方鄉土或檔案史料，從而整理出鉅細靡遺的方志，對後來研究者而言也算是累積相當豐富的地方史料。然而，若編纂者急就章完成，通常往往成為政治人物的政績，卻毫無參考價值。而廟宇沿革志，如果編纂者除了強調神威顯赫外，也能細心整理其歷史沿革及祭祀圈之發展過程，對理解地域社會亦可留下一定參考價值之史料。

其次則是族譜史料，近兩年來，僅有約 7 筆。對於該宗族在臺灣之發展，族譜也可提供一定之參考價值，然而是否完全可靠，也需要經過相當之考證。



3. 工具書、文字史料類之未來出版展望

概觀近兩年工具書、文字史料類（含史料介紹、解讀）的出版情形，總計有工具書 30 筆，史料介紹、解讀類 37 筆，文字史料類 309 筆，成果不可謂之不豐。如果粗略觀察，可知其實主要是官方或學術出版單位較願意投注心力及經費，不計成本整理此類型資料。相關之展望簡單總結如下。

首先是工具書類，近兩年工具書以年鑑表譜最多，且側重執政之政治人物，建議未來可收羅對立面政治人物或臺灣地方政治菁英之年譜，以豐富相關史料。目錄類史料部分，臺灣學者對整理目錄工具書已有相當傳統，惟主題性目錄仍多是日本學者代勞，自然有所側重，未來建議臺灣學者可投入更多主題性目錄編纂並定期更新。事辭典之編輯，近年多為過去成果之延續，僅有《臺灣總督府檔案事典》算是較具新意，未來建議針對各時期及各主題產業等都可逐漸編纂相關事辭典，以豐富臺灣史學界之實用工具書。近年來具有指標意義之工具書當屬《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觀諸近兩年來幾乎占據文字類史料一半篇幅的口述歷史資料，更可見該書之出版，正好呼應此一熱門領域之需求。

就工具書整體而言，未來政府機關如何與學界攜手合作、共同開發符合研究者所需之工具書，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其次則是史料介紹部分，因不易分類，故本文以時期進行，由數量來看近現代（日治以後）占壓倒性多數（37 筆中之 26 筆）。建議未來史料介紹解讀作者，可多加思考該批史料對該研究領域所能帶來的不同解讀或視角，當能更加豐富史料介紹的深度，亦即介紹者也需要有整體研究領域的視角，帶領讀者知悉該新史料補足了失落拼圖中的哪一塊。

最後則是文字史料類出版，其中口述類占了約半數，主題也相當多元，近兩年多了戰爭相關主題的口述訪談，也開始挖掘女性、原住民及在臺日人的生命經驗。筆者認為，在製造口述史料時，也需帶著理論的反省意識，如本文所提林傳凱提醒的社會結構對口述歷史受訪者的影響，以及訪問時間點所能訪問的世代侷限等問題，未來在口述訪談時，也需多加考量。日記類資料則有日治時期官員、臺灣人及中國近現代史人物日記的編輯出版，日治時期受過教育的臺灣人多少有書寫日記之習慣，期許未來能挖解更多庶民或從事基層公務、公司者的日記，以豐富臺灣的日記史料。



文字史料類的第二大項即史料（古文書）彙編、復刻、編譯出版，近兩年成果可說相當豐碩，資料時間斷限涵蓋早期到戰後。筆者期許未來相關出版單位可建立相互合作網絡，將有限之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整理臺灣史各時期、各領域的史料。

（二）大眾生活史

陳文松所撰〈休閒娛樂與日常生活：日治時期大眾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首先指出，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隨著數位資料的應用、日記史料接連問世，帶動臺灣學界與出版界新一波既可稱為新文化史，又可稱「新」新文化史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風潮。他又指出日常生活史的理論基礎，與其說是從新社會史到新文化史，毋寧說是從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合流而產生，只是發展較新文化史為晚，研究取徑有異於新文化史。新文化史逐漸與全球史接軌，反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卻更貼近於在地化。

不過，由於仍處於初步萌發階段，不管是日常生活史理論的建構或方法論的探討，研究成果並不算多，在臺灣史研究，亦尚處於「發展中」的狀態。對此，陳文松首先從資料的出土，指出其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關係，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源頭，與臺灣近一、二十年來，對日記史料的發掘、解讀與出版，甚至數位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作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史料學主要工具——日記史料價值與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性，有必要以較長時期的光譜來加以論述。從日記史料衍生出日治時期臺灣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育樂」等各層面，都引發研究者企圖透過日記史料更貼近、了解那個時代，以及不同時代下臺灣人內心的真實面貌。

陳文松首先點出這種逐日、長時期書寫的日記，是一項珍貴史料與時代證言，而這些生活瑣事，正是研究日常生活史的寶庫。這些資料的出土，促使研究者開始以不同的視角，重新關注文獻。例如 1916 年出版的《臺灣列紳傳》，雖是 1980 年代研究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本土土地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人物傳史料，使後人得藉以分析臺灣社會階層內在理路的發展與地方家族史、殖民統治史的百寶箱；1930 年代後，臺灣民報社所出版一系列不同時期的《臺灣人士鑑》，堪稱 1990 年代後期迄今，隱含剖析臺灣社會更廣大不同階層休閒娛樂的「趣味」（興趣）帳。該增列的「趣味」欄，竟成為後世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畫龍點睛」之作，恐怕遠遠超出編者意料之外。



除了史料討論外，陳文松以陳柔縉、蔣竹山對大眾日常生活史的描繪，說明過往從關注知識階級，轉而對大眾日常生活之關注，即研究的主體，還是要回到進行這些「日常性」生活營為的人本身。很明顯的，日記史料都是能文善墨的知識階層所留下，而為數更多的所謂「大眾」或「公眾」，往往不容易留下紀錄。為找尋這些不知名的大眾之主體性，或將日常生活史研究奠基於更廣大的基礎上，「大眾」如何「生活」的研究，不僅是日常生活史，同時也是大眾生活史（公共史學）共同研究的歷史課題。

陳文松因此認為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與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尤其兩人充分運用報紙和日記這類最具日常生活性的史料，並企圖顛覆主流學院派歷史書寫的既存框架，不僅要貼近時代、底層，更希望以貼近現代讀者日常生活的「目線」來重新詮釋歷史。這點由兩書甫上市，便紛紛長據暢銷書排行榜寶座，可知這種「類小品文」的日常生活史書寫深受讀者喜愛。由此，文中也指出日治時期日常生活的休閒與娛樂之研究成果，幾乎含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不同型態，且涵蓋不同族群的不同階層，範圍從個人娛樂、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等。

至於近兩年內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有王靖雯〈論吳新榮的愛情觀與家庭觀：以《吳新榮日記全集》為主〉、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1890-1945）〉、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周俊宇〈もう一つの新嘗祭：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祭日としての展開〉、顏杏如〈從「常夏」到「四季」：日治時期在臺俳人中的季節感與生活寫實（1895-1936）〉、李毓芳〈《臺灣日日新報》所見之明治時期（1895-1912）漢人音樂戲曲活動〉、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日治時期戀愛論述史〉、陳靜寬、黃裕元〈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二戰時期（1937-1945）相關商品文物看臺灣本土社會的戰爭觀〉、曾品滄〈日式料理在臺灣：鋤燒（スキヤキ）與臺灣智識階層的社群生活（1895-1960年代）〉、曾品滄〈戰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展〉、戴華萱〈「寧願燒盡，不願鏽／朽壞」之精神內涵：從《馬偕日記》探析馬偕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戴鳳碧〈飲酒新時尚：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飲酒文化與消費〉等。專書則有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陳煒翰《日本皇族的臺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



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等。

從以上羅列的專書或論文，可看出對日治時期日常生活的休閒與娛樂研究，幾乎含括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種不同型態，且涵蓋不同族群的不同階層，從個人娛樂、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的探討都有。

最後，陳文松提出「日常生活史，是瑣碎的日常生活研究？」這項生活史研究最常遭遇的挑戰，他引用了2014年10月呂紹理在學術社群網站「歷史學柑仔店」發表的〈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闡述日常生活史的奧義與重要性：

專業史學何以會與大眾如此疏遠？如何拉近此一鴻溝？我以為，日常生活史的探索，正是消弭鴻溝的重要途徑。如果稍微觀察一下書肆的表現，我們將會發現，各種與生活史相關的通俗作品，不管是包裝在「懷舊商品」之下的商業空間，或者仍具有一定程度學術規範的《西方文明初體驗》《島嶼浮世繪》等書，都極受歡迎而銷售一空；相對之下，日常生活史要獲得學術界肯定，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準備。由於有些人認為這類關注日常生活瑣事的歷史是「雞零狗碎」甚至「聲色犬馬」，不但目光如豆且失去了史學為時代諫言的宏旨。這種基植於「大敘事」的眼光，限制了吾人對於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重要人生經驗和歷史意識的理解。在我看來，生活史既可滿足大眾的好奇與懷舊，它更有非常積極的政治社會經濟的意義。它既包納了芸芸眾生的欲求、經驗與記憶，牽動出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更幽微地映射了時代的容貌。¹⁴

從上述引文，陳文松指出作為歷史研究的日常生活研究，確實某種程度翻轉以往偏重「英雄豪傑」的史觀，企圖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生活情境，去理解卸下層層武裝和防備後、歷史人物不輕易示人的另一面向，同時重建其日常生活的樣態，與時代的大歷史進行互動式對應。

當然，日常生活史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並不少。陳文松指出，首先，日常生活的事物，並非不辨自明，加上，何謂「日常生活」的界定與看法，也往往人言言

¹⁴ 呂紹理，〈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2014年10月10日），發表於「歷史學柑仔店」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7月17日，網址：<https://goo.gl/uaANC4>。



殊，缺乏鮮明而嚴謹的定義。其次，作為日常生活史研究重要材料的日記史料，誠然各種不同書寫者的日記確是「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同時，透過日記紀錄毫無遮掩地坦露在所有讀者面前。生活萬象，千絲萬縷，如何將其「議題化」、「學術化」且以小見大，並非易事。這也使得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看似容易，實則難以駕馭。最後，日記史料在日常生活史活用的面向，目前大多集中在休閒娛樂生活和飲食文化議題，如何擴展至其他經濟生活、政治活動，甚至心態史研究，可說仍有相當大的延展空間，同時更期待今後有更多生力軍投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行列。

（三）政治史

1. 內政治理

林果顯〈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以內政治理為中心（2014-2015）〉一文，以2014-2015年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內政治理為中心，回顧臺灣學界為主、旁及日文與英文的研究成果。在具體議題上，政權轉換時官方與臺灣社會的互動、政府內部與美國因素的介入，以及海外臺灣人的處境成為觀察重點；受惠於資料庫的建置，省議會和地方政治運作的研究增加，另外，白色恐怖的成果亦相當豐碩。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臺灣的處境，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為內政治理的重要主題。英文著作的作者相對多元，議題偏重國家認同、民主化、政策形成與國防。整體而言，政府單位或研究機構所建置的資料庫與整合型計畫，推動了新的研究面向，外語成果也可略見外國學界對戰後臺灣政治史的興趣所在。

（1）政權轉換諸面向

1945年政權轉換前後諸面向，包含各種制度的承續、轉化或斷裂，軍事與經濟接收時的細密過程和內外因素，中研院臺史所主題計畫「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所關切的焦點正是政權轉換時期的各種現象，部分成果集結為《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為此項議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其中，黃英哲以〈〈藤野先生〉到臺灣：論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一文，以戰後在臺日僑雜誌《新聲》的譯本為例，說明戰後在臺灣的日本知識分子。黃氏認為，面對此一文學作品的不同態度，可觀察當時在臺日人對過往歷史



與未來「中日友好」的連續與斷裂問題。王泰升〈中華民國法制「去內地化」的進展與侷限〉研究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實質上已去內地化，但在領土範圍及行政區劃和組織上，對去內地、去一中則有「欲去還休」的態度。憲法增修條文「曖昧」的態度，使全國性法律在「去內地化」有超越不了的障礙。鍾淑敏以〈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說明從戰前到戰後，日本政商界和民間人士與臺灣有關係者所成立的組織，其功能、人脈關係與相關團體的分合情形。許雪姬〈滿洲國政府中的臺籍公務人員（1932-1945）〉則說明日治時期前往滿洲國發展的臺籍公務人員，其前往動機、代表性高官，以及在中央與地方各部門的臺灣人，並略為述及這批人士在戰後回臺後的情形。文中指出和在北京、上海、廈門和廣州等地風評頗惡的臺灣籍民相比，赴滿洲國的臺灣人素質整齊，擔任公職人員最多，在當地少有欺壓當地人形成黑幫的事蹟，對戰後臺灣建設亦有貢獻。

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臺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1941-1956）〉，藉由水利事業相關名錄，探討日治末期至1950年代中期臺灣水利組織的人事情形。研究發現除了嘉南大圳人事組成多由日人擔任外，日治末期吏員高層的日人較多，但中下層職位臺、日人相當，評議員則以臺人勢力為主。至1956年水利會實施改進前後，1948年前出身日治時期水利組合的菁英，其影響力大幅滑落，但1948年後行政部門支持的領導人全面接掌各地委員會，1956年菁英與日治時期的斷裂成為常態。

政權轉換之際，軍事接收為重要面向之一。曾令毅〈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楊護源〈終戰後臺灣軍事占領接收的籌備準備（1945.08.15-10.31）〉，運用臺灣與美國檔案，論述軍事接收所涉及的國際政治考量，甚至政府內部派系鬥爭的問題。

1945年臺灣政權轉換的過程中，除了涉及多語言與多國籍的檔案，有諸多面向分屬不同學術領域。林果顯對何義麟的專書《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進行如下的歸納：「說明何氏著作從傳播研究出發，以涉及戰後在日臺灣人地位的重要衝突澀谷事件為例，觀察臺灣媒體在二二八事件前如何與上海和東京連結為訊息交流圈，二二八事件後逐步壓縮接收國際新聞與言論的空間；接著由《內外時報》觀察在日臺灣人如何利用華僑／戰勝國人民的身分，取得GHQ統治下稀少的新聞紙配額，在戰後初期日本僑界與日本新聞界當中扮演相當的角色。何



氏且由在日留學生報紙及僑報，觀察戰後臺灣留日學生左傾的過程，發現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並未使這些海外臺灣人直接投向臺獨運動，轉而支持新中國的比例相當高，補足了海外臺灣人政治史的空白。沿著此路徑，結合外交部檔案，考察在日臺灣人關於二二八事件論述的演變，探討海外臺灣人認同的不同階段與選擇。最後，從臺灣與日本的法制出發，探討在時代轉換中的「前殖民地人民臺灣人」，在戰後日本被賦予什麼樣的法律地位、如何在國際政治下形成「永住權」制度，並以蔡朝炳的經歷為中心，說明歸化日本籍臺灣人的政治主張與活動，在生活中遭遇國共兩黨的壓力，以及返回臺灣的曲折歷程」。

(2) 地方政治運作

關於地方政治運作的研究成果，林果顯指出「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的建置，對相關研究有重要影響，例如王靜儀〈臺灣省議會職權演變分析（1946-1998）〉，梳理了省議會不同階段的職權變化，並分別說明省政府軍人省主席、文人省主席與省長時期，省議會職權逐漸提升以及與臺灣政治結構變化的相互關係。吳俊瑩〈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則以省議員對「違警罰法」的批評，說明戰前臺灣人從日治時期法律生活經驗、對司法權的認識，以及憲法精神為論述根本，在憲政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上展現歷史經驗的延續。歐素瑛〈臺灣省參議會對日產糾紛之調處〉，從歷次質詢、發言與提案，梳理省參議員在日產糾紛調處上的角色。

廖彥豪、翟宛文的〈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指出土地改革過程中，由於（臨時）省議會的「建議案」形成相當程度的政治壓力，使戰後臺灣土改成為「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

吳沁昱〈戰後初期新竹政治的活動：以新竹市參議會為中心（1946-1950）〉、賴信真〈戰後臺灣第一屆女性中央民意代表初探〉、盧文婷〈雲嘉地區地方政治家族的形塑比較：以許家班與蘇家班為例〉，則關注地方民意機構，以及女性為主的政治家族，與地方政治勢力、政黨和個人特質的關係。

(3) 白色恐怖與治安體制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顧恒湛〈隔離、監視與滲透：戰後初期臺灣山地治安體制建構之歷史考察



(1945-1952))，討論臺灣原住民的白恐經驗與戰後初期臺灣山地治安體制的建立，解明了過去較少論及戒嚴時期以原住民為對象的政治史課題。

另外，在大眾史學、歷史記憶等概念引入歷史分析中，有幾項研究成果值得關注。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解析「大眾史學」的形成結構，當事者的「言述空間」也深受結構條件影響。鄧宗德〈臺灣白色恐怖的記憶保存之道：以萬新鐵路歷史暫跡為例探索白色恐怖事件與臺北盆地邊緣之關聯性〉，以曾行駛於萬華至新店的「萬新鐵路」為主軸，說明沿線各站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淵源，將白恐與城市發展、記憶相互連結。蘇瑞鏘〈論馬英九對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則分析總統馬英九對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說明他只偏重狹義的「紅色政治犯」，卻對臺獨政治犯視而不見；反省白色恐怖時一方面哀悼受害者，另一方面則歌頌加害者，批評戒嚴卻也肯定戒嚴等矛盾作為。

文末，林果顯以內政治理為主題，回顧2014-2015年研究成果指出以下特色。首先，內政治理中的外國因素被諸多研究重視，不論是美國、日本或中國在歷史過程的身影，益見鮮明。在史料開放的預期下，具有跨域意義的內政研究可能更多，與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之間的對話，或可繼續觀察。其次，是新議題的開發。政權轉換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土地改革在政治史上的意義，也吸引不同學門投入，換言之，戰後初期政權變動與政府體制重建的歷史，在新史料與新觀點的影響下受到重視。最後，從所援引的史料可看出對資料庫與重要史料的倚重。省議會史料總庫、日記資料庫、國史館的兩蔣資料，以及臺灣文獻館的省級機關檔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案管理局收錄的資料，或林獻堂、蔣介石日記與口述訪談紀錄，幾乎散見於各研究。

(4)日本學界研究成果

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林果顯以日本《史學雜誌》每年5月號對日本歷史學界過去一年的成果分門別類介紹為基礎，指出〈臺灣〉項下的政治史方面，日治時期研究較多，集中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家認同等問題，戰後則多集中於外交史（日華／日臺、美國外交政策）。

其中，延續「臺灣範圍的國民國家」概念，若林正丈以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場景為例，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喊著「臺灣加油」的口號，凸顯出「臺



灣」與「中華民國」（但隊名為「中華臺北」）的複雜關係。由此出發，討論作為國民國家的晚近性、不被主要國家承認的例外性，以及因此而展現的特殊國家性。而在若林正丈主編的《現代台湾政治を読み解く》中，小笠原欣幸從雲林縣的例子，說明臺灣地方選舉的運作以及派系逐漸弱化的現象。松本充豐提示臺灣研究的未盡課題，包括半總統制的比較（總統與總理／行政院政的關係）、2000年政黨輪替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系統性研究、兩黨黨內派系研究、新興民主國家比較研究中的臺灣特殊性、總統化的政黨以及半總統制與選舉等問題，挖掘臺灣研究的定位。岸川毅認為臺灣1950年代以來呈現「臺灣範圍」民意的（臨時）省議員，在1970年代後轉向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以及青年黨和民社黨提供了部分臺籍菁英政治舞臺，皆應重新審視。清水麗、前田直樹與松田康博等人則從臺日、臺美及臺中關係出發，說明作為主權國家的「臺灣」所面臨的國際處境。

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可見政治史研究在議題與材料上的開拓，例如江柏煒、林美華所著〈軍事最前線金門島からの呼び声〉處理了媒體與冷戰時期金門對中國廣播心戰的歷史，以及林果顯〈台湾における日常生活のかなの「反共知識」構築〉，從1950年代的廣播節目內容，說明反共意識型態如何滲透至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若林正丈〈康寧祥と「党外」の黎明：台湾オポジション第2次組党運動前夜〉，則討論了1970年代前後，康寧祥的「身體」如何促成黨外人士的團結。

從這兩年的研究回顧來看，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的臺灣處境，以及相互之間的影响，同時，「中國」因素也經常在視野之內。而在內政治理上，以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為研究主軸。日本學界在史料、現地考察、理論的掌握，以及對研究視野反省，展現豐沛能量，但學科分際或許也使與臺灣學界的交流，產生一定的隔閡。

(5) 英文學界研究概況

戰後臺灣政治史的英文著作，有許多是臺灣研究者撰述，收錄於英文期刊或以英文專書發表，其中認同政治與文化政治、民主化過程、政策形成與國防政策近兩年研究成果較豐富的領域。例如王甫昌從福佬、河洛、閩南、Holo等名詞的辯論與演變，說明臺灣福佬認同的處境。林果顯則認為王氏分析中的福佬認同，對自我指



稱一直受到不同時期的外在環境所影響，因而此認同具有勉強而不太情願的面向。陳若蘭運用隨機係數模型分析1992、1996、2000與2004年臺灣人的臺灣認同，指出臺灣人如何一方面面對民主化過程中上升的臺灣意識，另一方面又因與中國日益緊密的經濟利益，而阻止了臺灣意識激進。黃義杰以2004年總統大選前「二二八牽手護臺灣」活動為例，說明創傷記憶如何導致臺灣國族認同的產生。

在文化、學術與政治方面，王莉雯以1950年代著名的反共戲劇「大巴山之戀」為例，說明反共懷鄉如何鞏固臺灣內部不同族群的國族認同。王俐容簡述臺灣從1949年後到現在的國家認同與文化政策，指出文化政策深受國家認同影響，但在外來移民與中國經濟影響下，政府很難制定同質性的族群文化與認同，文化政策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將變得更為複雜。歐蒂娜（Hardina Ohlendorf）分析中國的臺灣研究面臨兩難，說明若將臺灣研究視為自成一格的研究領域，將間接地挑戰中國再統一的理由，相對地，若強調臺灣與中國的共通性，則臺灣研究便證明臺灣具有改變中國的顛覆性角色。

民主化過程是戰後臺灣史的一大重點。吳重禮與戴士展指出國民黨透過調整意識型態、黨員結構、菁英組成，以及對反對力量的因應作為，使國民黨成功地從一外省政黨轉為本土政黨。Erik Moberg 比較韓國與臺灣的民主化經驗，分梳兩者共同的歷史條件與不同結構，並強調地方政治在兩者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林果顯指出上述英文研究著作中，從政治學、公共行政與社會學理論發想的比重甚高，研究時限也多晚近，並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時間流逝，這些研究成果與臺灣史學界的關係將更為密切，如何增進彼此對話的基礎應屬重要。另外，所回顧的英文著作有許多作者出身臺灣，一方面顯示臺灣學者努力將臺灣作為與既有理論或模型對話的案例，在國際學界發聲，另一方面也表示目前臺灣人以外的國際學者，對戰後臺灣史的關心，仍有拓展空間。

2.二二八事件研究暨國際外交史

另一篇政治史研究回顧的論文，為李福鐘的〈2014-2015年臺灣戰後政治史研究回顧：二二八事件及國際外交史之新成果〉，文中回顧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有關1950年代冷戰情勢下的政治、外交情勢相關研究成果。這些議題均因有關鍵性史料出土，新成果可觀，且足以帶動不同思考，以及未來進一步開展



對話或深入探討的可能。

(1) 二二八事件

2013年由中研院臺史所主辦的「新史料與二二八研究」研討會，論文發表人基本上皆使用了該所度藏的一批新購二二八事件史料「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由此完成的七篇論文，2014年下半由《臺灣史研究》以兩期「專號」發表，分別是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蔡秀美〈二二八事件期間消防隊員的角色〉、蘇瑤崇〈謊言建構下的二二八事件鎮壓之正當性：從「大溪中學女教員案」論起〉、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侯坤宏〈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角色〉、歐素瑛〈二二八事件期間縣市首長的角色與肆應〉，以及劉恆姣〈二二八事件中的自新：以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為中心〉。

其中，林正慧對保密局的討論，說明保密局臺灣站派駐各地的「通訊員」，在事件過程中持續向上級報告在地狀況，透過匯報內容，研究者可進一步分析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情報單位在臺灣情資網絡的構建狀況，而這些所謂通訊員報告內容的性質及其真實度，和日後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在事件中所作所為的關聯性等，說明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對情勢演變的重要影響。侯坤宏則藉由保密局在各縣市、鄉鎮布建的所謂「通訊員」上呈之報告，正好將原本不夠詳盡的各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組成人員，作進一步更清晰的呈現。這當然主要歸功於保密局在各地的各級通訊員，賣力蒐集並密報各地處委會成員名單，之所以如此，實係保密局早就將處委會視為帶頭作亂的在地有力人士，因此在事件過程中，首當其衝被當作情蒐和密謀鎮壓的對象。李福鐘指出上述研究將中研院臺史所收藏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進行了更為清楚的研究，看到情治部門如何早早將二二八事件導向預期的悲劇結局。其他各篇主要還是依靠1990年代以來長期累積的各種文獻資料，但仍可對二二八事件之諸多面向作更深入的鋪陳及表現。例如陳翠蓮則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軍統局、三青團、復興社，以及戰後在臺灣成立的義勇糾察隊等國民黨週邊各種組織，作更多介紹，並以陳逸松和劉明二人為背景，說明戰後初期臺灣政治活躍人士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的合作與矛盾。

2014-2015年間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研究尚有其他論文，按照出版時間先後次序，分別為劉熙明〈二二八事件中涂光明刺殺彭孟緝真實性之平議〉，指出涂光



明雖隨身帶槍但並未企圖行刺，反而是彭孟緝被涂氏等人所提出的九條「和平條款」所激怒，藉口將涂光明逮捕並槍決。溫秋芬〈臺灣人旅京滬團體228救援紀實〉則利用楊肇嘉的個人檔案，對二二八事件前後旅居上海、南京的臺灣人社團有更進一步的報導。天江喜久〈朴順宗：二二八事件中朝鮮人／韓僑的受難者〉則觸碰過去較為人所忽略的外國人在二二八事件中之遭遇。曾文亮〈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亂與懲罰：兼論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與法律關係〉，從1947年年初國民政府的法體制，檢討二二八事件中對臺灣進行軍事鎮壓及實施軍事審判的合法性。此取材角度在過去因屬傳統所謂「民國史」的領域，與19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戰後臺灣史領域始終不曾深入交流互動過，因此有關1947年之際在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之歷史研究，與二二八研究在學術上一直都處在兩個不同的軌道上。曾氏這篇文章，儘管試圖分析1947年之際國民政府的法制序與政治潛規則，但因欠缺對國民政府的了解，在結論上仍有進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間。

(2) 蔣介石研究與 1950 年代臺灣政治史

有關1950年代圍繞著蔣中正政府的內政、外交、軍事政策之研究，已成為近幾年來戰後臺灣史的重要焦點。2014-2015年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集結成2本專書出版，一是黃克武主編的《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另一本是呂芳上主編的《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蔣介石研究熱潮的出現，其實與2006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有關。前述兩書，共收錄論文28篇，李福鐘挑選了若干具爭議性或關鍵性的議題，加以討論。

趙席夔〈1950年代的蔣介石與顧維鈞〉討論了蔣介石的宮廷政治。顧維鈞是中華民國1949年遷臺之際的駐美國大使，這樣一位專業又資深的外交官，在面對蔣中正寧可任用私人親信而不願信賴正常外交體制的決策作風，經常有苦難言。趙文將這個層面的史實過程描寫得十分傳神。李福鐘接著以此文為例，說明引用《蔣介石日記》作為史料時必須小心，例如日記有時是蔣氏個人抒發情緒及表達一己意見的地方，萬不能當作歷史解釋的持平之論。

上述兩書尚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議題與論點。例如王文隆所寫〈國際參與的調整〉及〈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二文，對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初期以對美外交為主要工作項目的外交環境，作了背景的分析介紹。類似性質的文章



還有許峰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1950-1960）〉，主要為其過去發表有關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費攤付問題之再延伸擴充。李福鐘特別指出吳俊瑩〈戒嚴體制下的臺灣〉一文，在一些基礎的法制面、制度面及歷史面，作了相當細膩的考證。包括1949年5月20日以來有關戒嚴令頒布的程序瑕疵問題、保安司令部和警備總司令部的組織變革，以及戒嚴頒布後對臺灣民間社會的權利剝奪等，其中自然亦包括非現役軍人因政治案件必須遭受軍事審判的相關規範和法律過程。吳氏這篇論文的發表，應可為日後的白色恐怖歷史研究，提供更清晰可辨的史實基礎。

(3) 戰後臺灣外交史研究

整體來說，2014-2015年有關戰後臺灣外交史的期刊論文並不算多，大略只有陳儀深〈臺灣主體、中國屬島、或其他？——論葛超智《被出賣的臺灣》所揭露的美國對臺政策〉、許育銘〈冷戰時期東亞局勢下的琉球與臺灣關係：以1966年中華民國琉球友好訪問團為中心〉、李福鐘〈1961年美臺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爭議〉等數篇。相關成果，大致集中於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與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兩書收錄多篇外交史論述，包括王文隆〈蔣中正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際參與的調整〉二篇；周琇環同樣有〈蔣中正與韓戰反共義士的來臺〉、〈美國的經援與軍援（1945-1965）〉二篇；林孝庭〈從中、英文檔案看冷戰初期「敵後反攻」的實與虛（1950-1954）〉；趙席夔〈1950年代的蔣中正與顧維鈞〉；許峰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1950-1960）〉等。從這10篇論文的主題，可看出有關1950-1960年代全球冷戰高峰下的臺灣外交史研究，明顯是近年的一個熱門議題。

此外，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1949-1988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與汪洋的《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值得關注。前者全書內容並非以學術界習慣的檔案文獻徵引方式進行冗長論證，而是較偏向一般讀者熟悉的歷史故事書形式，這或可說是「冷戰史」逐步進入閱讀市場的徵候。至於汪氏一書，使用了英國外交部檔案，對1949年以後英國政府如何辯論和制定對中國政策、以及影響對臺政策，作出了相當精簡卻周延的說明。林孝庭和汪洋關於冷戰初期美國、英國與臺灣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歷史論述，再次說明冷戰研究在廿一世紀的一〇年代，看來確實仍是一方興未艾，甚至蒸蒸日上的領域。



(四) 經濟史

經濟史為題的研究回顧論文有兩篇，一是李力庸的〈2013-2015年臺灣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梳理農業史近三年來的發展趨勢，一是林文凱的〈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2012-2015工業史研究為主的分析〉，則主要辯證工業史學者觀點上的差異與變化。

1. 農業史

農業史方面，以農、林、漁、牧業、糧食與農產貿易、知識的建構與傳播及組織、政治與社會等不同主題討論。

(1) 農、林、漁、牧業

農業史反映了臺灣各地、各階層的開發成果，其議題廣及開發、家族、商業網絡、區域發展、殖民統治及其治績等，近年來農業史議題轉而重新檢討有關農業近代化、米糖經濟與農家經濟及其區域觀察。同時，亦有不少新議題，例如過去較不受關注的罌粟、特殊作物、水果、花卉，或因海洋史發展逐漸受到注目的漁業相關研究，相形之下林業及牧業的發表較少。

莊天賜〈日治明治後期彰化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說明彰化在清代南糖北米中位於米作南界，如何在殖民政策推行甘蔗增產品種改良、水田蔗作，及區域競爭的調整下，開啟彰化地區新式製糖業發展的契機。又如鴉片相關研究，臺灣史過去在日治時期專賣制度與鴉片、鴉片與社會文化的影響已有相當成果，然而，作為鴉片原料的罌粟則鮮有討論，蔡承豪〈探查、擬策與嘗試：日治前期臺灣罌粟的調查與經營〉及日本學者栗原純在隔年發表〈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關於專賣局的罌粟栽種〉，指出罌粟種植易受國際原料的供應市場影響，因此總督府著手在臺栽植，但最終受限臺灣的環境及生產成本過高，推廣困難。

其他如過去鮮少受到關注的特殊作物、清代水果、花卉，這兩年亦有文章討論。張靜宜《日本統治後期臺灣「特殊農產物」增產之研究(1934-1944)》，有系統地將日治後期各種特殊農產物的增產做一統整，指出臺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已開始注意熱帶作物與試作；王藝都〈清代臺灣水果研究〉，運用一般熟悉的方志、熱蘭遮城日記，航海日記與長官書信集，加上清代官宦文士的詩歌文集，



討論二百年間水果在臺灣的在地化過程；張慧娟〈花開物語：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與再造〉認為田尾花卉產業的形成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總督府認為園藝活動是穩定人民精神的最佳方法，為安定臺灣的社會秩序及提高臺灣人對日本母國的忠誠度，藉由柔性的花卉文化推廣，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提高臺人認同感及文化水準，日本的精神指標「菊花」則為推廣主力。另外，張素玠〈「後米糖」時代的農業盤整：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為中心的探討〉，討論1960-2010年濁水溪沖積扇平原農業的變化，同時在國際情勢、貿易局勢的改變下，該地區土地利用的轉變，以及工業與農業之間屬環境史的討論，都值得繼續深入。

(2) 糧食與農產貿易

清代、日治時期及戰後的相關議題，都聚焦在糧食的管理方面，臺灣糧食生產後的管理及與其他地域貿易的相關議題，黃順進在〈19世紀中葉臺灣的米穀貿易：以進出口數據為中心的探討〉，以美國領事報告所附帶的「1855-1856年臺灣產品出口表」、英國駐華領事貿易報告及臺灣海關統計資料，重新討論臺米銷往中國的問題；戰後糧食管理有蘇瑤崇〈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及曾獻緯〈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兩篇處理的年代互有重疊，在糧食流通管制上從不同角度分析，可互相參照；薛月順〈農復會與臺灣的糧食增產（1948-1960）〉則將時間尺度延伸至戰後中期，透過農復會與農林廳等農政機構的組織工作，經過復原期，其成果反映在多項農作物產量的增長，而在此後1960年代所建立的產銷制度，文中亦多有著墨。

除了米糧的管理與貿易外，近年農產貿易議題延伸到豬隻的相關貿易，如曾品滄〈生豬貿易的形成：十九世紀末期臺灣北部商品經濟的發展（1881-1900）〉，指出臺灣農民將養豬視為副業，然而豢養的豬隻亦是重要的商品。主因為臺灣人在生活中使用豬肉甚為普遍，加之，豢養豬隻有助於水稻作與旱作生產，然而開港前後，致使農業生產體系變化，豬隻生產減少後，反而須倚靠中國輸入生豬，形成生豬貿易體系；辛德蘭〈臺灣與日本之間米與海產品的交換：長崎華商泰益號的跨越海洋網絡（1901-1910）〉和〈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的貿易品：以稻米、生豬為例〉，則運用不同的史料討論臺灣與日本之間的糧食貿易，分析個別商號如何經營跨洋貿易網絡及不同類目的貿易項目，臺、日商人各有不同的掌握權。



(3) 農業知識的建構與傳播

李力庸觀察到農業知識的建構與傳播是這幾年的熱門課題，討論品種知識書寫過程、害蟲的觀念與統治者治害蟲的方法、原住民農業知識的轉型、高等農林學校的林學畢業論文、水產教育的師資、帝國之間牧牛知識的交流、戰後農業推廣體制的建立與稻作技術推廣。時間涵蓋清代到戰後，地域上延伸至美國在菲律賓的牧牛業。

有關農業知識的建構，蔡承豪以十九世紀北臺灣各方志的稻種篇，佐以清代檔案以及日治時期的農事調查、報導、稻種圖鑑等，構成〈地方農識的書寫與呈現：以十九世紀北臺地區稻米品種變遷為例〉，可了解清代對農業知識的認識，張耀宗〈知識轉型：日治時期農業知識的轉變〉、呂紹理〈從螟蟲到螟害：近代臺灣農業害蟲及其防治〉、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之造林學研究：以林學科學生畢業論文為中心〉、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教育：以師資分析為中心〉等篇章中，可見殖民科學強調近代科學知識建立和傳播，日本殖民政府建立一套不同於以往的農業教育、知識體系，且不僅限於農業，更推及林業、漁業。葉爾建〈二十世紀初日治臺灣與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則跳脫單一帝國內部的活動，而以臺灣及菲律賓的相關文本，討論臺、菲之間牧牛業的知識流通。

(4) 組織、政治與社會

日治時期臺灣各地成立農會、產業組合，組織當時農民並在推廣、增產等工作上影響臺灣農村甚深，直到現在仍可見相關系統在地方上的經營。相關組織與地方社會、基層金融關係亦緊密結合，一直是農業史關注的焦點。林蘭芳〈日治時期產業組合與臺灣農村〉、李為楨〈1910-40年代臺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之考察：以產業組合與農會為中心〉，以及黃仁姿〈農會的檔案與歷史：以戰後農會與合作社分合的派系紛爭為例〉，分別討論日治時期的產業組合與農民、戰後產業組合與農會的分合以及制度變遷等議題。戰後部分，林杰民《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立與臺美青年交流（1951-1965）》，以及陳思賢〈中華民國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農業技術合作過程與影響（1965-1971）〉，分別以四健會及中華民國援外技術的討論，重建臺灣農業從接受外援到有能力外援、乃至於輸出技術或相關農業合作的過程。



李力庸總結農業史近年的發展，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所延展，其次農業史可見不同領域的寫作，雖各有不同的關注焦點，但仍值得互相參考。同時，她亦提及對學術傳承及地方文獻的農產文化傳承之憂心，除了博士培育減緩的現象外，受到大環境影響，地方文獻所刊載資訊可跳脫傳統文獻史料的限制，但在歷史書寫上須更細緻的處理，這兩點都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2. 工業史

工業史回顧部分，林文凱歸納出三個重要研究議題，透過辯證指出近年工業史與過去最基本的不同，即經濟史研究開始提出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並正視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延續性，以及戰前技術教育與臺灣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面連結。最後則提及近年中國學界亦相當關心「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發展，但受左派帝國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與前述研究成果呈現不同的樣貌。在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觀點的辯論與更新中，林文凱指出晚近以來的臺灣工業史討論，基本上是站在殖民近代化論觀點上對帝國主義論的一系列修正。

2012 年以來，臺灣與日本學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主要論點修正，藉由爬梳高淑媛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從中發現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典範轉移現象。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與技術、教育相關議題，林文凱則舉出不同工業史學者的研究觀點，在各研究中互相對話，日治時期主要討論日本技術人才的供給及工業教育體系的建立，戰後則是根據不同學者，討論臺灣技術人才與外省技術人才如何在日人離開後承繼發展臺灣的工業。

除了民間工業發展的技術人才外，近年，許進發討論了工業研究機構在不同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其範疇著重於機構本身的組織、人員以及相關業務成果，幫助我們了解總督府直屬研究機構的工業研究，這也提示了不同工業教育機構的研究仍待進行。

（五）環境史

環境史領域興起於1970年代對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視，從而影響西方史學界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視。李進億於〈2011-2015年臺灣環境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指出臺灣環境史的發展脈絡與世界環境史相仿，約自1990年代開始，臺灣的環保意識



及相關社會運動同步進行，致使相關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其中1990年代之代表成果，係由中研院劉翠溶院士等人所提出之《臺灣環境史研究》計畫報告，經過逾二十年的發展，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本年度臺灣史首次以「環境史」為題回顧相關議題。

首先，李進億以區域發展、水利事業、環境保育、產業經濟，最後則是人類／動物關係為具體回顧議題，許多議題與經濟史多有重疊，主因在於環境史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問方式幾乎是人類如何在環境中生存，涵蓋範圍自然廣及人類如何利用並與自然環境互動。

區域發展是指透過小區域研究，可凸顯不同區域的特色，避免將臺灣視為一均質的整體。過去「區域」的範圍多為行政區域上的討論，環境史則以自然環境的區域劃分，具體例子有1970年代中研院張光直主導之「濁大流域人地研究計畫」及1990年代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之「四溪計畫」，近年代表成果則為張素玢《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一書，以「河川流域」、而非傳統行政區劃為研究場域。此外，范毅軍計畫主持、李宗信與顧雅文協同主持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臺江內海地區的人文社會經濟發展〉亦為一例，該計畫屬跨學科的研究，表現上充分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整合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並以視覺化工具呈現，這種方式亦為環境史的研究趨勢。

水利事業的討論在過去也多有研究成果，其中水利秩序已成為臺灣環境史中的重要課題，而陳鴻圖提出的「人－水利－環境」三者互動關係，成為現今許多研究的方向，水利秩序的概念牽涉到國家力量、埤圳主、引水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為環境史與水利歷史研究的良好題材。

環境保育部分，討論議題目前仍不多，僅有2011年曾華璧《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及賴莞頻〈一九八〇年代臺灣環境運動的社會與文化考察〉。環境史的終極關懷仍希望建立過去史實，提供現代借鏡，因此該領域仍待開墾，產業經濟部分曾華璧〈釋析十七世紀荷蘭據臺時期的環境探索與自然資源利用〉文中指出荷蘭人、漢人在開墾、獵捕梅花鹿、商業上不同的做法，而過去留下的文本也可見荷蘭人對漢人環境資源利用觀的批評，但這樣的說法與現代環境保育的觀念截然不同，最終的目的仍是為確保其商業利益，因此，以梅花鹿數量大量減少來說，雖說執行者為漢人，但實際上卻是荷蘭殖民者鼓勵的結果。顧雅文〈日



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則以金雞納樹的栽植與製藥為主題，討論日治時期栽植的始末，而臺灣栽種的背景不僅是臺灣瘧疾問題，更有世界發展的因素。林家禎〈從環境倫理觀點看八仙山林場之變遷〉，則以環境倫理觀點分為不同時期，探討人類與自然如何共處，是以八仙山林場發展至今，受國際林業發展趨勢影響，已脫離早先開發為主、而重視永續觀念及森林生態系的經營。三篇文章取徑各異，卻各自反映了不同時間點人與環境長期互動之後，因不同目的，逐漸掌握方法利用、改變應對自然的方式。

人類／動物關係中則強調人類如何利用動物滿足經濟、醫療與娛樂。呂紹理〈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一文，說明螟蛉對臺灣社會的不同反映。臺灣社會普遍存在養子，常以「螟蛉」借喻，是以在日治時期的戶口名簿常見螟蛉子，但由於害蟲觀念的傳入，改變了臺灣社會對螟蛉的認識；相關論文還有鄭麗榕長期關注歷史上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動關係，〈「體恤禽獸」：近代臺灣對動物保護運動的傳介及社團創始〉一文中可見臺灣的動物保護概念由傳教士傳入，但在日本人的組織之下得以推動，而到了戰後動物保護觀念才得以普及。此外，張素玢〈移民與山豬的戰爭：國家政策對生態的影響（1910-1930）〉及沈佳姍〈牛豬並濟：日本時代臺灣獸疫預防的轉向〉、〈瘋狗退散：臺灣在日本時代的狂犬病接種防治〉，可見殖民政策在本議題上的影響，移民村的開墾以及醫療衛生的防治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環境、動物與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

(六) 醫療史

蔣竹山〈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近代東亞醫療史研究的再思考〉一文，回顧臺灣醫療史發展二十多年間的軌跡，並佐引近年西方、日本等相關著作，從全球史、東亞區域等角度，提出他對全球發展趨勢的觀察，同時回顧臺灣醫療史相關著作。

醫療社會史的發展起於1970年，而臺灣地區的發展為最近二十年，二十年間醫療史的社群橫跨不同領域，如：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及公共衛生領域等。目前研究社群分別由中研院史語所「醫療史主題計畫」、中研院人社中心「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陽明大學「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及政大文學院「身體與文明研究」發展出不同研究課題，主要議題有醫療圖像的知識、分類與觀看、圖像中的病人形象、圖像與醫學知識的建構、影像中的疾病與醫療、圖像



與博物學交流、圖像與博物館展覽，相關的社群與議題敘述詳見蔣文。

近兩年回顧，蔣竹山分就「文化轉向」後的醫療史研究：新文化史取向、全球視野：疾病的全球史研究、物質文化與全球視野：藥物的流通與消費討論影響醫療史的研究方向，以及現階段的相關課題，說明醫療史受到文化轉向的影響，從而展開六個主題，分別是「衛生、出版文化與國族」、「性別、身體與國族」、「圖像、視覺文化與醫療史」、「飲食與健康」、「醫病關係」及「醫療與日常生活」。其中「衛生、出版文化與國族」中提及，過去醫療史的研究對出版文化並不熱衷，這裡所指出版文化是過去所出版的醫學相關書籍，藉由研究過去醫療書籍了解過去如何理解醫學、衛生、身體等議題，相關著作有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及《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等。胡成則是中國少數採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醫療史學者，其研究課題圍繞在「不衛生論述」，描述華人如何處理他人對華人群體「不衛生」的論述，同時運用西方近代公共衛生的概念改善自身的「不衛生」，這說明當時華人如何接受與抵抗西方所傳入的新文化。回過頭來，日治臺灣醫療史尚未有人循上述方法進行研究，唯一較為接近者當屬林淑慧，以《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為主要材料，參考過去醫療史研究中的相關題材，如范燕秋、朱真一、許宏彬及雷祥麟的醫療史研究，分析、歸納其內容後，蔣竹山認為遊記不僅再現歐美醫學現代性，還隱含帝國與醫學的關聯。

「性別、身體與國族」部分，主要講述身體史的興起與發展現況，臺灣方面有傅大為2005年的著作《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臺灣》及許佩賢〈戰爭時期臺灣健民運動的展開〉，討論的文章並不多。最具體的代表成果，可見范燕秋主編的《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一書，具體以許佩賢有關健民運動以及收音機體操舉例，說明日本殖民政府在戰時體制下，如何致力於打造理想國民。

「飲食與健康」的課題則可將之放在商品與消費文化的脈絡下，郭婷玉的〈1930年代葡萄酒廣告的健康訴求與臺灣社會〉文中可見以葡萄酒廣告分析其論述策略，以符合臺灣社會的需要，藉以推廣做為商品的葡萄酒。

「醫病關係」部分，雷祥麟在中、西醫論戰及近代醫病關係有相當的成果，〈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追溯中國現代醫病關係的誕生過程。而後，



提及鼠疫是東亞醫療史的關注重點，姜鍾赫以1894年的香港鼠疫問題為例，關注華人女病患，此文涉及殖民政府推展公共衛生概念時，並沒有太深刻的考慮當時被殖民者的社會文化，致使西方醫學與男性醫生成為公領域的目的，侵入到私領域的華人家庭。反而是教會醫院招聘及訓練一批華人女護士，成為華人婦女接觸西醫的管道之一，臺灣醫療史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參考林昌華〈「醫者」或「患者」馬偕：探討馬偕博士與疾病的糾結關係〉及賴郁君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的臺灣漢醫藥〉。

「醫療與日常生活」課題中，中文著作不多，有關何謂日常的討論，以及什麼是日常生活史視野下或新文化史視野下的醫療史？目前中國學界可見使用姚永概的日記、《翁同龢日記》、《翁心存日記》、《緣督廬日記》，討論日記敘事中個人對患病、治療、醫療的自身體驗，以討論過去對醫療與社會、或醫療與個人的議題，臺灣史學界以日記作為史料在醫療文化史領域中的運用，如李力庸〈食物與維他命〉、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又如林丁國透過吳新榮的日記探討小鎮醫生的行醫記事，李朝凱〈一家清潔，病毒不住：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家屋清潔與環境衛生觀的建立（1912-1925）〉等，透過日記史料探討臺灣人的營養知識及運用、健康觀、公共衛生體系等。

醫療史的相關議題，未來應可與全球史繼續對話，在全球視野：疾病的全球史研究中，分別討論西方疾病的全球課題、殖民醫學與現代性、鼠疫與全球史、癩瘋病及其他疾病的研究，西方疾病的全球課題以疾病的全球史，全球的公共衛生、跨國的醫療組織、職業公害等課題為其典型，而其他如Ronan Foley以全球的觀點，探查水與健康的關係，政治與疾病、醫學社群移民等，多在本範疇之內。

殖民醫學與現代性部分，近代亞洲的疾病研究多由社會史的角度討論，而由殖民醫學的觀點出發，讓我們得以重新省視帝國主義與醫療的關係。近代將西方醫學視為進步的、優等的，是以，被看見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從傳統、落後、骯髒的成為近代、進步、衛生的，然而若採取殖民醫療的角度描述，我們可以發現，近代中國或臺灣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殖民過程，透過醫療、衛生、健康觀的建立，將人民導向一個近代的國民。

有關鼠疫與癩瘋病的研究，近代亞洲的鼠疫問題，可視為國家醫學和殖民醫療的問題，具體來說，近代亞洲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多與殖民者或西方國家的研



究有關，換言之，鼠疫問題常伴隨討論殖民母國或西方國家的公衛體系如何影響近代亞洲建立公衛體系。癩瘋病議題則更顯複雜，癩瘋病在十九世紀後期甚至被視為種族優劣的評定標準，但事實上這種疾病可見於各個不同的地域，而在西方基督教強國的論述下，成為種族、社會階層之間一種歧視的標籤，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亦可窺見當時對癩瘋的恐懼。

最後，蔣竹山以物質文化與全球的研究視野，將藥物視作商品，以消費文化的角度舉出相關研究，關注植物、藥與商業的關係，這種帶有文化轉向特色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可見於西方國家的研究，更可視為物的交流史。透過物質交流，藥的物質文化也成為新文化史視野的醫療史研究重要方向之一，目前可見的研究主體，除了單一藥材大黃、常山、人蔘的討論外，亦有藥品乃至衛生用品等衍生物如仁丹、肥皂等。物質文化的研究方向也影響了通俗的史學讀物，如《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及《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討論鴉片、南京蟲、奎寧及海人草等，可視為藥物、技術與商業關係的例子，以南京蟲為例，蟲害危害當時生活，可能引發火災及人身感染，後來透過藥物、商品的研發，逐漸讓當時的人們脫離蟲蟲危機。

蔣竹山指出這波醫療史的文化轉向與全球視野，開展了過往醫療史研究未曾關注的課題，同時期東亞醫療史可參照全球醫療史的研究視野，例如近來胡成與梁其姿的研究，分別關注南京廢娼及中國癩瘋病人與現代世界，但作者也強調，並不是所有醫療史議題都須從全球史的視野切入，如何描寫一個具有在地化特色而同時關照到全球意義，或許是有意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七）文學史

2014-2015 臺灣文學相關的回顧與展望分別有黃美娥、游勝冠分別論述明鄭時期至 1949 年，以及 1949 年之後的研究；相關研究，就產量觀之，探討明鄭以降至 1949 年以前之著述，計有專書 9 筆、單篇論文 84 筆、學位論文 32 筆；1949 年以降迄今之相關著述，計有專書 5 筆、單篇論文 32 筆、博士論文 19 筆、碩士論文 176 筆。就臺灣文學系所數量而言，此一產出成果可謂豐碩，惟細觀研究成果之趨勢與內涵，雖有值得肯定之成長，亦有需反省及借鏡之處，茲分述如下。



首先，關於明鄭及清領時期之研究，成果較為有限，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前期》一書，藉由「自然寫作」之主題綜論臺灣古典詩歌中的詠物詩、災害書寫、八景詩等，得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自然書寫相互參照及對話。徐麗霞《清治到日治時期之臺灣文學研究》係一論文集，其內容展現作者紮實的考證功力。游適宏《以賦憶賦：清代臺灣文集賦的仿擬與記憶》專就臺灣賦進行探討，指出其與清代賦學集體記憶之關連性及「題聚一唐」之現象。其餘如林以衡〈臺灣古典文學中的「地震」：以清領到日治時期的臺灣詩歌為例〉，劉萱萱〈臺灣古典詩中澎湖的海洋與自然書寫：從清領到日治時期〉，盧建成、陳國川〈清代初期臺灣方志的風景選擇〉等單篇論文，分就地震、海洋與方志風景著眼，得與上述蔡氏之專書合觀；甯國平〈涪江詩人林豪生平暨著述研究〉，楊凌宇、柯榮三〈臺灣府儒學首任教授林謙光生平事蹟考辨〉，分別以田野調查、考證等研究法探討人物個案之生平事蹟。

其次，日治時期研究方面，因數量頗為可觀，茲依主題分為古典文學、新文學、通俗文學三類擇要評介。

關於古典文學研究，林淑慧《旅人心境：臺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一書，詳細鋪陳臺人前往中國、日本、世界和島內旅遊的內在心理、感官視覺、文化流動、跨界翻譯及敘事策略等，值得肯定。吳毓琪《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社群的文化流動與傳播翻譯》，論及達爾文「物種進化論」在日治臺灣報刊中的傳播情形、古典文人之譯介狀況和相關創作之轉化詮釋；同時，留意「全島詩人大會」之活動樣態與社群網絡、相關傳播報導的文化意義等，無論題材或研究視角均饒富新意。歐純純《賴惠川竹枝詞研究》將《悶紅墨屑》與《續悶紅墨屑》並觀，且內容涵蓋層面豐富，有超越先行研究之處。劉小鈴《日治時期日臺傳統文人書畫研究》，有助於從美學層面深度理解文人之文藝涵養與創作能力。

除上述專書外，以日治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為主題之論文亦復不少。江寶釵、王韶君皆以連橫為研究對象，前者探討連橫「地方」書寫之內蘊意識，後者剖析連橫「漢民族意識」與「民族史書寫」之關連性，二者所論得以相互對照；翁聖峰延續其關於新、舊學之研究，運用新史料再探新、舊文學交迭軌跡之張力；廖振富亦延伸其櫟社相關研究，剖析詩社活動興盛之原因，各文均對既有的個案研究進行更深度之探討。



另，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蕭蕙文〈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廖振富、張明權〈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臺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黃美娥〈從「福建」看近代臺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等文，均聚焦於臺、日間的漢文學問題。白氏與蕭氏二文分別以尾崎秀真、初山衣洲為研究對象，有助於解明在臺日本漢文人之生平經歷與人際網絡。廖文點出臺／日／中漢文的跨界交流、移植與挪用之複雜性；黃文則關注臺人內渡回歸與日本南進對福建文學新秩序之影響，試圖與閩南文化研究、海峽文化研究相互對話，以探尋新研究趨向之可能性。

關於新文學研究，作家作品論一如往昔，為主要研究趨向，尤其張我軍、陳火泉、楊逵、張文環、龍瑛宗、黃得時等具代表性之作家，仍為研究焦點，如沈芳序〈張我軍對胡適文學思想的傳播與接受：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3-1932）〉、陳采琪〈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吳嘉澂〈國家戰爭動員下臺灣人日語作家的「倫理」論述分析：以張文環與楊逵為例（1937-1945）〉、陳龍廷〈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小說再現的日治時期南投〉、王俐茹〈「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1939-1943）的多重意義〉。此外，在臺日人相關著述之研究成果亦屬豐碩，如陳允元〈「新體制」下的社會／自我凝視：濱田隼雄〈甘井君的私小說〉的脈絡性閱讀〉、陳萱〈日治時期日本女性的臺灣書寫：以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為中心〉、許麗芳〈殖民時空下的多重視角：佐多稻子〈台灣之旅〉（1943-1944）的臺灣書寫〉，各篇論著之探討對象皆透過創作與臺灣社會相連結，惟其身分、角色不一，創作面向與作品文類亦不相同，故充分彰顯此一課題研究之豐富性。

臺灣文學與東亞之關係素來亦頗受關注，崔末順〈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壇與韓國〉一文，提綱挈領地匯集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文學與朝鮮關係之研究成果；李文卿〈「皇民文學」、「親日文學」：大東亞語境下的複線視野（1941-1945）〉，以比較文學視角探討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臺灣與朝鮮兩地的文學發展。林沛潔的碩士論文〈臺灣文學中的「滿洲」想像及再現（1931-1945）〉，透過報刊報導、作品敘事、文藝政策、文壇刺激、口述回憶等面向，剖析臺灣與滿洲國在文學上的關連性，其資料蒐集完整，章節設計出色，堪稱佳作。



歷來較少人從事的性別研究、原住民文學及左翼文學研究，亦見研究者投入耕耘。性別研究方面，如王琬葶〈世界的聲響：日治時期臺灣女性雜誌的女性主義閱讀（1919-1939）〉、朱惠足〈日本帝國下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日治時期小說中的臺日通婚書寫〉分別由女性雜誌中的女性主義和小說中的臺日通婚書寫著眼；原住民文學方面，簡中昊〈日治初期警察官眼中的臺灣原住民形象：以〈生蕃探險記〉為例〉、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不約而同以日治時期山地警察、理蕃警察為對象，剖析其書寫中所呈現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題材具有新意。左翼文人或文學作品、文藝思想之討論，則有陳培豐〈連戰連敗的文藝大眾爭奪戰：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流行歌謠與左翼知識分子〉一文，專就「聲音」入手，指出民俗歌謠、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三者均試圖建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之可能性，係陳氏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之延伸。而游勝冠另撰〈近代化肯定論的迷思：鄉土文學論戰與臺灣話文派的自我東方化〉，針對陳氏先前關於鄉土文學論戰之討論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二人對鄉土文學論戰之史料與發展有不同的詮釋與評價。此外，賴松輝〈文學鬥爭、文學武器論、文藝大眾化：論賴明弘的普羅文論及其理論內在衝突〉探討鄉土文學論戰期間，賴明弘與《南音》作者群之間有關文學階級性、民族性的筆戰；陳偉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軌跡：黃天海與《明日》雜誌〉探討無政府主義者黃天海之生命史及其作品；高嘉勵〈被壓制的群體反抗書寫模式：以日治時期臺灣和日本無產階級文學之比較研究為中心〉以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和楊逵〈送報伕〉為例，比較分析 1920-1930 年代日、臺兩地「群體反抗」書寫模式之異同，各文觀點、研究取徑雖異，惟皆有助於左翼文學研究之深化。

關於通俗文學之研究，延續先前的研究熱度，或在先行研究基礎上做補述或對話，或開創新議題，各有貢獻。其中，林珮吟〈性別化的現代性：徐坤泉與吳漫沙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從現代性和性別研究的視角重探徐坤泉、吳漫沙筆下的女性角色及其修辭策略，對作品人物角色及文本書寫策略有極佳的掌握與考察；陳惠貞〈《南瀛佛教》故事體作品研究〉留意《南瀛佛教》中的故事體作品，選題頗具巧思，皆值得肯定。

綜上所述，近兩年日治時期文學史研究無論產出數量、研究課題之深化與開拓、論著內涵等均頗有可觀，令人欣喜。而課題多元之現象亦可見於戰後初期



(1945-1949)文學史之相關研究。蓋此一時期，文化場域受到政權轉換之衝擊，文學秩序面臨重構，自然出現多元議題之探討。黃美娥〈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一文，即關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秩序重整、文學典範建構之問題，以及左、右翼勢力競逐、新、舊文學消長之現象。亦有從作家個案研究著手，如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臺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李知灝〈遺民幻夢：戰後初期張達修遺民想像的幻滅與重構〉都以南投古典詩人張達修為探討對象，關注其國族認同與心靈結構，勾勒其遺民意識於戰後的流變與書寫概況。陳淑容以〈雷石榆〈臺南行散記〉分析：後二二八的風景與心境〉探討文化人雷石榆自1930年代以降與臺灣文學界之淵源，並藉由其作品〈臺南行散記〉考察文中所反映的社會現實。黃惠禎〈錢歌川的臺灣經驗與原鄉意識〉分析他在臺17年間的文學創作，有別於一般的反共懷鄉文學，實暗藏對官方文藝政策之消極抵抗。王俐茹〈彌合歷史的艱難：以作家龍瑛宗、楊雲萍戰後初期(1945-1949)的「中國」歷史敘事為例的探討〉，觀察戰後初期臺人如何反省戰前的殖民生活與國族認同轉變的心理結構。

文本分析方面，彭玉萍〈如何用詩？戰後初期臺灣古典詩壇：以《心聲》為例〉藉由新竹地區的詩刊《心聲》觀察「光復」當下詩人如何面對臺灣／祖國、漢文／國文之接合性。黃英哲〈〈藤野先生〉到臺灣：論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以一篇刊於日僑雜誌《新聲》的魯迅作品〈藤野先生〉所引發的政治效應，探討中日雙方對於兩國「友好」所抱持的態度。

另有研究者留心戰後初期的文學社群與文學典律，如蔡明諺〈戰後初期臺灣新詩典律的建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一文，對銀鈴會同人和《潮流》之概況，有詳細的鋪陳釐辨。路丹妮、陳正賢〈臺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廣泛蒐集戰後初期相關期刊的出版目錄和作品集，俾以數位量化方式探討投稿者彼此間的群聚關係，嘗試為文學研究帶來新方法，亦值得肯定。

相較於1949年以前文學史研究相關著作之豐富性與多元性，1949年以後的相關研究成果則面臨主流人文主義主導、形構學術研究文化之問題。故整體而言，論著產量雖多，能以批判性眼光省思臺灣文學地位者則屬鳳毛麟角，張俐璇



之專書《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乃為其中之一。張氏關注當前臺灣文學史論中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存在之現象，試圖以寫實主義作為詮釋框架，省思百年來臺灣小說書寫的發展脈絡，呈現寫實主義因應外在政治、社會結構變遷而產生的多樣面貌。此書不僅提示文學史論的新視角，亦點出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史論者之影響。類似者，林肇豐〈臺灣、香港本土論的發展與比較研究〉、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文學〉二文，對主流論述隱諱不談的現代主義與美援體制之共謀關係，亦有深刻的反思批判。餘如王信允〈書寫發聲與運動實踐：解嚴前後《南方》的邊緣戰鬥與文化批判〉、陳涵書〈「一九四九」敘事的變遷及其意義研究〉、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臺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等論文，均對少數者及其文化被邊緣化的歷史條件進行檢視。

相對的，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及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臺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則對影響臺灣文化發展走向的去政治化文化保守主義「新傳統」持正面評價。尤其張氏過度強調現代主義的藝術表達模式，論述偏重作家的藝術表現形式，忽略作家觀照現實之慧眼，此一脫歷史、去政治化的詮釋視角，是否限縮論述發展的多面性，造成理論思考的故步自封，值得吾人深思。

以後現代的解構邏輯或純美學概念作為包裝，操作「文化區隔」，將臺灣本土文學簡化為民族主義，乃是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如劉乃慈《奢華美學：臺灣當代文學生產》一書，援引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研究 90 年代臺灣小說，卻抽離該理論中的權力支配觀點，將不對稱的兩種概念——空間性的「本土」與時間性的「後現代」相對立，混淆狹義的後殖民主義與廣義的後現代思潮，刻意忽視臺灣民族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間的關連性。相反的，致力凸顯臺灣本土文學後殖民性的劉亮雅，在其著作《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中，卻是從後殖民理論入手，援用後殖民、文化與性別理論剖析後解嚴小說中的後殖民議題，探討臺灣後殖民在文學與文化實踐上的諸多面向，細膩呈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與劉乃慈的論述迥然不同。未來戰後臺灣文學史研究面對高舉美學、去政治化及貶抑本土的主流人文主義之宰制，如何進行深度的反思與解構，使現代與後現代文學研究不再流於老調重彈或游離歷史現實，尚待研究者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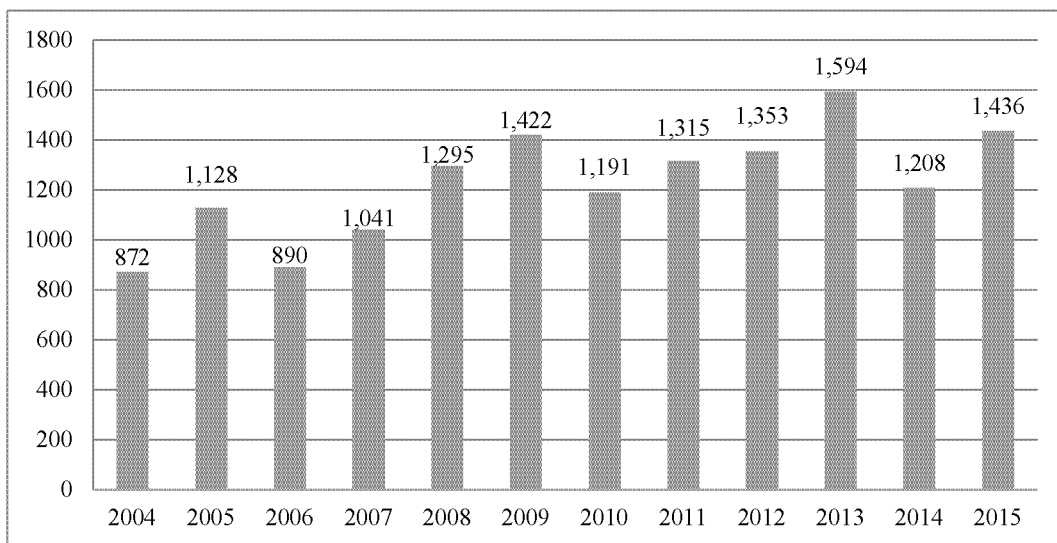


三、研究評析與展望

以下將中研院臺史所自2005年起出版之《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及迄今之〈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相關數據進行統計與觀察，並特別比較博、碩士論文與整體數據。

根據《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歷年書目統計觀察（圖二），自2004年以來的年度書目數量，僅有起始的2004及2006年不到千筆，2013年首度超過1,500筆，2014-2015年雖各有增減，但保持相當的數量，整體趨勢而言仍是向上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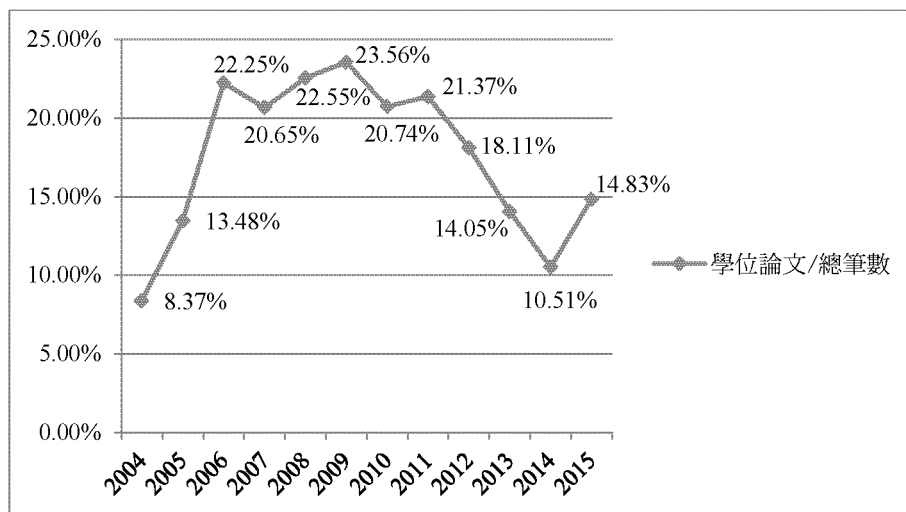
以學位論文與年度書目之比例來看，綜合十多年來的數據，趨勢變化如下圖三。自2011年後下降比率較為明顯，2013年甚至是自2006年度以來首度低於15%、幾乎回到2005年的數量，2014年則為近十年來最低，僅有10.5%左右。博、碩士論文數量攸關臺灣史領域新血的培育，近年速度減緩應與大環境的改變有關，除了政治氛圍外，文科碩、博士生出路不佳，未來在員額減招的情形下，恐持續維持在15%左右。



圖二 《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歷年書目總筆數統計

資料來源：筆者統計所製。





圖三 歷年博、碩士論文與書目總筆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筆者統計所製。

學位論文與研究斷代之比例，臺灣史研究之研究斷代多分為通論、早期（荷、西、鄭氏）、清代、日治、戰後（1945-），以下仍延續過去幾年的統計方式，作為數據分析的基礎，相關數據如下表一。

表一 博、碩士論論文研究斷代比例表

	通論	早期	清代	日治	戰後
2004	16.44%	0.00%	19.18%	19.18%	45.21%
2005	13.16%	1.97%	13.82%	30.92%	40.13%
2006	23.08%	1.03%	7.69%	35.38%	32.82%
2007	8.37%	0.00%	10.23%	34.88%	46.51%
2008	31.58%	0.33%	5.59%	28.95%	33.55%
2009	37.21%	1.45%	8.14%	17.44%	35.76%
2010	31.08%	0.40%	7.97%	28.29%	32.27%
2011	26.69%	1.35%	5.74%	32.77%	33.45%
2012	23.29%	2.01%	6.83%	26.91%	40.96%
2013	33.19%	0.88%	7.08%	22.12%	36.73%
2014	13.60%	0.80%	6.40%	44.00%	35.20%
2015	36.79%	0.47%	6.60%	24.06%	32.08%

資料來源：筆者統計所製。



以研究的時間範圍觀察，臺灣史研究仍以戰後之相關文章獨強，每年都占有30%以上的比例，其次則以日治時期為多，其原因不脫許雪姬教授在〈2004-2013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所提，史料較易取得與判讀，日治時期雖有語言上的限制，但在師資相對充沛的情形下，仍有一定的數量。然而在史料數量的基礎上，清代臺灣史仍維持自2008年以來的比例，較為可惜，若比例繼續失衡，對臺灣史研究仍有一定的隱憂，至於早期研究則多受限於語言門檻以及史料，近期而言，持續發現與譯介外文史料仍是重要工作，但長期而言，如何持續培育具解讀荷文、西文、德文等早期外文史料能力的碩、博士生，值得臺灣史學界重視。

根據《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中學位論文的分類方式，將學位論文與研究類別之比例，相關數據整理如下表二。關於論文研究類別的相互消長，大體而言仍維持往年的比例，政治、經濟類約為25%-30%上下，社會、文化類則自2008年以來都約在60%以上，不難發現博、碩士論文的研究趨勢仍受新文化史的影響。

本文不另以總體出版量分別分析的原因在於，過去的類別統計變動與統計方式不一，難以有共同的基礎做比較。另外，根據《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4-2015年度的經濟類成果來說，分別有129、178筆。即使2015年度成長近3成，單就數量而言，仍與政治類、社會類、文化類有一定的差距，但若以研究時期來看，雖

表二 博、碩士論文分類比例表

	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	總類
2004	21.92%	19.18%	56.16%		2.74%
2005	25.66%	23.68%	45.39%		5.26%
2006	27.69%	20.51%	46.15%		5.64%
2007	27.44%	17.67%	48.37%		6.51%
2008	14.51%	18.30%	31.55%	31.55%	4.10%
2009	14.49%	17.05%	32.95%	32.10%	3.41%
2010	12.30%	22.62%	24.60%	40.08%	0.40%
2011	13.09%	20.47%	21.81%	43.96%	0.67%
2012	12.45%	20.48%	22.89%	43.78%	0.40%
2013	9.29%	13.27%	37.61%	39.38%	0.44%
2014	14.17%	14.96%	27.56%	41.73%	1.57%
2015	9.39%	17.84%	30.99%	41.31%	0.47%

資料來源：筆者統計所製。



仍集中於日治時期與戰後，早期臺灣史的經濟類表現反而突出，未來或可另作更細部的分析。

另外值得給予關注的是，臺灣史研究與公眾史學之間的關係。由臺史博研究員謝仕淵與同館研究助理陳涵郁合撰之〈博物館的公眾史學實踐：以「臺史博」為例的討論〉，論述主要集中在公眾史學與博物館的關聯性，以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為題，參酌周櫟楷、張隆志等人對大眾史學、公眾史學的界定，認為博物館應被置於應用史學的脈絡下來理解，但其應用行動的目的，應有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的實踐」。

事實上，對公眾史學概念與實踐的討論，是理解臺灣史研究、甚或臺灣史之於社會的重要切入點，但由於以公眾史學為題進行研究討論的文章相當有限，而當代社會中與公眾史學有關之現象，卻又過於廣泛，因此，謝文設定以臺史博為討論場域。

具體來說，文中透過「博物館藏品、研究與公眾史學」、「當代典藏：博物館、歷史知識與社會行動」、「特展的公眾性」、「對話新工具：雜誌與戲劇」等章節，分別處理博物館如何透過蒐藏來彰顯並論述特定議題，如同歷史研究透過史料識讀堆砌其論述方向，博物館的蒐藏與研究反映怎樣的價值，蒐藏由誰決定？來自何方？又如何與「民主社會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的實踐」產生關聯？其次，透過具有公眾史學意識的博物館之社會行動，如何具體的改變了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而這樣的改變，又如何影響我們對公眾史學的想像？再者，博物館以其展示與社會大眾溝通，因此展示規劃的構想、策略與目的究竟是什麼？則是另一項嘗試回應博物館如何實踐公眾史學的基本課題。最後，博物館以其跨域性，運用多元工具，透過雜誌編輯與展示戲劇應用，嘗試開展公眾史學的實踐面向。

首先，文中指出博物館的蒐藏，如同史料選擇與歷史編纂的過程，到底是誰決定的？其來源如具有廣泛性，則可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文中指出博物館蒐藏方向的廣泛性，關注日常生活、大眾文化，資料類型上，除了文獻、物件，也包括聲音資料。其次，臺史博的收藏文物大約四分之一來自捐贈，從公眾史學的觀點來看，捐贈文物不僅填補進一個由研究者所制定的臺灣文物分類架構，且是一種將公眾之歷史及其記憶與博物館互為激盪的過程，透過捐贈行動成就一段特定範疇的歷史，如何匯聚於博物館，被寫入臺灣歷史的歷程。捐贈文物行動本身，是在體現臺灣歷史書寫、展示與研究，如何給予個體足夠的能動性之民主化過程，相對於任何以政治、



菁英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捐贈行動實有助於建立、累積多元歷史機制的推動。

就博物館的歷史研究而言，除傳統政治、社會、經濟史等研究課題，也關注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等新課題，以及歷史知識的生產，如何產生一種轉型正義關聯的社會行動。以終戰七十年的研究與展覽為例，從戰爭的生活史與戰爭遺緒等兩個視角，提出從戰爭的生活經驗切入，反應戰爭經驗的差異性，進而解構特定立場的戰爭之框，都可能是一種政治的強加。博物館研究員與志工，整理一、兩百本文獻，透過戰時生活之物，與如何得知終戰時刻和當時的感受等資料整理，拼湊出一份極為多元的戰爭面貌，進而質疑那幅以戰後史為起點的戰爭之框，其實與戰後東亞民族國家如何以捏塑戰爭歷史，進而構成統治正當性的經驗有關。另外，從戰歿者遺族在戰後的遭遇為例，說明戰歿者的歷史在戰後被抹除，及其存在於民間社會的反差，有待經由具轉型正義價值的社會行動，將被隱蔽、扭曲的歷史公共化，讓歷史知識有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的實踐。

關於博物館的研究典藏與社會互動，謝文也指出臺史博藉由 318 公民運動物件蒐藏與 206 地震物件搶救，說明博物館如何透過當代典藏的概念，開展具公眾史學意識的社會行動。將行動本身視為一種對話，材料選擇注入一種民主化的機制，博物館並不急著用展覽或其他型式書寫歷史，但應確保此項行動中，對各種聲音同等重視；博物館的當代典藏，與公眾史學強調的民主社會實踐習習相關。

就「特展的公共性」而言，謝文以「臺灣女子·非常好」、「看見平埔：臺灣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等特展為例。透過展出常民女性的生命史與日常細節，引領觀眾體會尋常，並期望讓小歷史（屬常民的日常生活、個人生命史）與大歷史（現代化視角鋪陳的歷史）對話。而凸顯平埔族群形象的歷史建構性質，再以個人／家族故事帶入平埔主體在面臨外力變化的因應——平埔並沒有消失，更非單純「漢化」。運用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帶領觀眾認識平埔族群文化的多元性，並非僅是相對於「高山」原住民的單一族群；而「被展示者」的主體性，則透過策展過程的田野調查與諮詢會議，成為展示內容形成的另一股力量，再搭配親筆書寫給時任總統的抗爭書信等較能激發當代觀者情感的物件，落實在個人與家族故事的呈現。有關移民的展示，並非僅止於呈現一歷經艱苦適應而「日久他鄉作故鄉」的故事，特展更進一步與展出對象共同討論、生成展覽，推廣活動亦邀請邀展相關社群前來分享己身的經驗與



故事。策劃過程預設了兩種人群的互動，對一般觀眾而言，達到對遷徙、離散經驗的同理心理解、尊重與包容；移動者，則能分享自己的遷徙、離散經驗，進而反思自身生命與臺灣時空演變下社會結構的關係。

而「對話新工具：雜誌與戲劇」，謝文則以《觀臺灣》編輯經驗為例，透過「過去事，現在式」的概念，以「讓自己也覺得有趣」的方式來敘說歷史，更加貼近讀者，並以歷史為思考向度來詮釋臺灣人的生活。然而，生活史單元並非僅是擷取一段過去的生活片段或現象加以描述，也期望拉長歷史變化的縱深，強調時間感與歷史意識。再者，透過趣味化手法，嘗試將歷史知識轉化成紙上的電玩關卡、心理測驗、政論節目、臉書、BBS 文章、徵婚啟事、報紙、購物網站等，亦即採用今人熟悉的理解方式，設法加以置換歷史元素，靈活操作流行文化、網路用語、笑點，合理的建構出古人的舉動或臺詞，博得讀者會心一笑，引發進一步探索歷史。這些成果，加上與臺灣高鐵刊物《T-Life》、「故事」網站等平臺合作，進一步擴展上述推廣歷史策略的效益。

最後，戲劇應用則以《大肚王》、《草地郎入神仙府》、《一八九五開城門》、《彩虹橋》等大型互動戲劇為例，說明透過教習劇場的精神，對若干歷史議題的設定，構思各種引領參與者進入歷史的互動策略，讓其從主動參與的過程中，了解該議題的歷史背景，從而對特定的核心課題，在以歷史背景的合理想像基礎之上，展開各種不同可能的思考。

論文最終指出，對生活在臺灣的臺灣史學術社群而言，由於「在場」的位置，促令臺灣史學術界無法不去面對這些挑戰，進一步來說，對存在於社會，許多被稱為應用、文創的領域，該如何面對臺灣史知識的挪用與想像現象，或更聚縮在公眾史學的領域，如何在以歷史知識為基礎，促進特定公共議題的對話，也無從迴避。尚待定義的公眾史學與只能持續向前進的博物館，應是要從彼此對話中，逐步摸索公眾史學在臺灣的實踐策略與理論意涵。

對此討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恒安教授回應，他認為公眾史學在臺灣處於「前典範（或革命前）時期的百家爭鳴」，有各種如大眾史學、公共史學、公眾史學、應用史學、普及史學、實用史學等看似接近、但理念實則都不同的名詞，要如何透過實踐與對話，釐清以上各種概念在臺灣的定義。陳氏進一步指出論文提出了過去臺灣較少被討論的三個問題。其一，從當代典藏中，指出現在就



是歷史，為快速變遷的當代社會留史料；其二，類似戰歿者與戰爭遺族的議題，是臺灣社會困難的遺產，也是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博物館自覺可藉由更具社會基礎的研究與展示扮演特定角色，有別於由「悲痛與追念」面對轉型正義的態度；其三，謝文指出博物館的公眾史學實踐，不僅是學術對話的範疇，也不僅針對狹義的博物館使用者，而是將博物館視為社會行動的基地、論述的發動地。

陳教授進一步指出博物館中的公眾史學，應是促進民主社會的發展與公共領域的實踐。然而，在這些帶有理念目的的行動中，應更進一步關切在to、for、by the people之外，希望觀眾怎麼「一起看」與一起做什麼？除了展示策展成果，或許也應展示「策展」本身，同時在知識的生產過程中，應如何界定夥伴關係？多元參與的時機與形式？希望觀眾怎麼「一起看」、一起做什麼？而由趣味引發的公共論述，又有如何的可能。此外，陳氏也提出博物館面對經營環境的挑戰。臺史博實踐公眾史學可能的妥協與利基，應是一實踐公眾史學所必須關注的問題。陳氏從學理與實務的面向，對博物館公眾史學提出諸多具啟發性的建議，有助於釐清博物館的蒐藏研究、展示與教育，如何扮演促進社會對話的公共領域角色。

四、結論

整體來說，《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14-2015年度共收錄2,644筆書目，包含專書544筆，論文1,763篇，學位論文337篇，這樣的成果，不能不謂豐碩。但許雪姬教授長期觀察2004-2013年臺灣史研究成果指出，雖然有不少成果的累積，研究視角擴大、研究空間延伸、議題多樣化，卻也有若干隱憂，例如政治對學術的影響、文史學科出路困難連帶影響臺灣史研究所報考人數，學生素質不免受到影響，以及研究瑣碎化，不同學科或跨領域如何增強研究對話，仍有待努力。時至今日，許教授的觀察雖已歷經兩、三年，依然具參考價值，眼前臺灣史研究的挑戰與危機依舊存在。¹⁵

¹⁵ 許雪姬，〈2004-2013年臺灣史研究概況〉，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2012-2013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地下一樓，2014年12月5-6日），「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8月7日，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



然而，臺灣史研究者孜孜不倦的推動研究事業，也在2014-2015年見到成果。例如口述歷史方面，除口述歷史成果外，許雪姬教授主持完成的《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可說是集過去一、二十年臺灣史學界發展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之集大成著作；醫療史、環境史、日常生活史等新領域的開展，也值得期待。

其次，公共衛生史、戰後史研究、二二八事件研究、蔣介石研究均有集體研究成果出版，此類聚焦特定議題的成果，對學術積累有其重要性。然而，這些成果的產生，基本上也與新史料的出土有關，例如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成果受保密局資料出版的影響，蔣介石研究則與其日記出版有關，新史料出土依舊與新研究的出現有著密切的關係。

再從蔣介石研究與二二八事件研究來說，歷史研究如何促進社會對話，當亦為另一值得思考的方向。蔣介石的歷史評價與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均無從透過情緒性語言找到答案，惟有透過紮實的研究成果，使問題得以被釐清，由此也指出臺灣史研究成果如何與公眾對話、解決社會爭議的可能，這或許也是個令學術社群反思臺灣史研究的切入點。由此，我們或得以在許教授指出、臺灣史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中，為臺灣史研究找到不同的未來。



引用書目

〈楊水心日記：世家大族的女性日記〉，「流轉風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下載日期：2016年11月29日，
網址：<http://herhisPtory.ith.sinica.edu.tw/Story17.html>。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4月1日，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

許雪姬，〈2004-2013年臺灣史研究概況〉，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主辦，「2012-2013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地下一樓，2014年12月5-6日），「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8月7日，網址：<http://thrrp.ith.sinica.edu.tw/>。

呂紹理，〈從「柑仔店」到歷史學：思考日常生活史與公眾（大眾）史的交錯〉（2014年10月10日），發表於「歷史學柑仔店」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7月17日，網址：<https://goo.gl/uaANC4>。

王美雯、陳怡宏、謝仕淵

2015 〈戰時生活物件與臺灣人戰爭記憶〉，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南市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戰爭與記憶：亞洲地區的經驗與論述國際研討會」，頁1-3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10月25日。

吳佰祿

2015 〈「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19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臺北）68(3): 11-48。

周婉竊

2003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傳凱

2014 〈「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臺灣》（臺南）8: 35-81。

郭明芳

2016 〈公館領頭理文獻，乙未一編嘉後學：評介吳密察主編《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臺中）6: 49-55。

陳佑羽

2015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新書發表會紀要〉，《國史研究通訊》（臺北）8: 233-236。

葉惠芬

2015 〈《陳誠先生日記》簡介〉，《國史研究通訊》（臺北）8: 222-225。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2014-2015: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hih-yuan Hsieh, Mei-wun Wang, Yi-hung Chen, and Wei-ying L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2014-2015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ecember 9 to 10, 2016) co-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These papers cover Public history, Industri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Medical culture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aiwan. The analysis also includes a review of *Annual Bibliography of Taiwan History 2014-2015*, focusing 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Overall, research results of 2014-2015 revealed that publication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ertain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the 228 Incident and Chiang Kai-shek, with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unearthed offering fresh insight and novel perspectives. This further corroborates the material-based characteristic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oreover, some research results such as those on Chiang Kai-shek, the 228 Incident, Post-war history, and Public health history were published collectively, thus consolidating dialogues on the related topics.

The recent emergence of public history and popular life history as research trends merits attention. These trends point out the many possibilities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he public, and serve to remind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f Taiwan history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importance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society.

Keywords: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Trends, Historical Data

